

农业农村部功能食品重点实验室成果转化中心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

通 讯

第 3 期（总第 375 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2021 年 3 月 5 日

◆ 习近平总书记给施平等新四军百岁老战士的回信·····	习近平（1）
◆ 施平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的题字·····	施 平（2）
◆ 热烈祝贺施平同志百岁大寿·····	郭书田（3）
◆ 在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王沪宁（10）
◆ 回忆与华国锋同志直接接触的几件事·····	郭书田（14）
◆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两个关键、四个招数·····	唐仁健（16）
◆ 粮食安全观·····	杜 鹰（21）
◆ 我为什么喜欢看《通讯》·····	刘宏昌（30）
◆ 问题视域下新中国 70 年“三农”的转型发展·····	郑有贵（35）
◆ 邓小平论农业改革发展二次飞跃当列为“重中之重”之重·····	李毓堂（43）

习近平总书记给施平等新四军百岁老战士的回信

习近平

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百岁老战士们：

你们好！来信收悉。你们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为党和人民事业英勇奋斗，期颐之年仍心系党史宣传教育，深厚的爱党之情令人感佩。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常读常新。你们亲历了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历史进程，更懂得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全党即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希望老同志们继续发光发热，结合自身革命经历多讲讲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引导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一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仰、勇敢斗争，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懈奋斗。

祝大家生活幸福、健康长寿！

习近平

2021年2月18日

（来源：新华社，2月19日）

施平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的题字

施 平



施平老人正在读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

施平激动地写下了作为一名百岁老人对于百岁大党的美好祝愿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 46 位百岁以上的老党员、老战士在春节之前，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切感悟，汇报了离休后积极参加党史宣传教育工作的情况。

2 月 20 日上午，正在华东医院住院治疗的新四军老战士施平，在反复阅读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后，找身边人要来纸笔，激动地写下了作为一名百岁老人对于百岁大党的美好祝愿，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落款 施平 111 岁。

施平，原名施尔宜，1911 年 11 月生于云南大姚。1926 年在昆明投身第一次大革命。1931 年秋考入当时的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在浙江大学读书时，他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两次作为学生代表直面蒋介石，力陈抗日救国主张。1936 年 4 月，从浙大毕业，参加革命后改名施平。

1938 年 1 月，施平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他是新四军粟裕、陈丕显的部下，担任地方党群领导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施平曾任中国农业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副书记。

（图片来源：中国青年报）

热烈祝贺施平同志百岁大寿

——回忆施平同志若干事例

郭书田

今年是受人尊敬的施平同志百岁大寿，上海市人大常委、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在上海隆重举行祝寿大会。我怀着十分高兴的心情回忆施平同志若干事例。

1953年10月，中央为了加强对北京农业大学的领导，决定由施平同志任副校长兼党委书记。校长是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民主建国会秘书长孙晓村。我当时任校长办公室秘书，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他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先后6年他对党的忠诚和崇高的品格以及对我的关怀、爱护和教育，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影响，难以忘怀。

一、在北京农业大学建校初期，由校务委员会领导学校的工作。校委会主任委员是华北大学农学院院长乐天宇同志，副主任委员分别是前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俞大维教授、前清华大学农学院院长汤佩松教授。乐天宇同志是老共产党员，早在30年代就读北平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为该校地下党支部书记，抗日战争以后去延安任自然博物院院长，被人们称之为“党内专家”。在三个农学院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时，他任校委会主任委员，实际就是校长。他到校后由于受苏联的影响推行米丘林——李森科生物遗传学，组建米丘林学会，亲自任会长，建立翻译室，出版了《米丘林全集》，把摩尔根遗传学说成是唯心的、反动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伪科学，停止了著名遗传学家李景均教授的农艺系主任职务，停止了遗传学及相关课程，停止了田间试验，而李由香港转去美国，发表谈话说“遗传学在中国死亡”（李景均在美国继续从事摩尔根遗传学研究，卓有成就，曾任国际遗传学会主席。在改革开放以后，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李开鼎专程去美国看望并表示欢迎他回国，因年事已高仍留在美国）。这件事引起了广大教师惶恐不安，反映到中央，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关注并派调查组核实后认为乐天宇同志犯了“学阀”错误，调离了农大，到林科院工作（乐天宇同志离校后从事林业研究工作。晚年自筹资金在湖南建立起九嶷山农学院）。这时中央决定派民主人士孙晓村任校长。施平同志就在这种形势下来农大任副校长兼党委书记。原来农大党的组织是总支部，党总支部的意见是通过总支委员、校长办公室主任扬舟同志向孙校长转达。在施平同志来校后总支改为党委，他兼任党委书记，与孙校长直接合作，相互尊重，关系融洽。孙校长深感有了施平同志，也就有了直接的依靠，十分高兴。施平同志十分尊重孙校长，放手由孙校长行使校长的职权，在校全校师生员工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这是一段党与非党合作最好的一个时期。我在1952年8月由昆虫系调到校长办公室，先在孙校长与扬舟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在施平同志到校后，又在孙校长与施平同志双重领导下工作，受益匪浅。1955年中央决定由

中央交通工业部调马适安同志任第一副校长，并成立党的核心小组（即党组），负责学校的领导工作，决定重大问题。1956年马适安同志调北京大学任副校长。后来，由于加强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央决定孙校长协助黄炎培先生担负民主建国会的领导工作，离开了农大，而校长职务未免。这时施平同志成为农大的实际主要领导人。

二、施平同志到农大以来，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处理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在一起的遗传学的教学与研究问题。北京农业大学的做法在全国高等农林院校中引起连锁反应。解决农大的问题也是解决全国的问题。在乐天宇同志调离农大以后，有些党员教师认为李景均出走美国是“叛国”行为，开展了批判，仍坚持米丘林生物遗传学，否定“基因”的存在。在政治压力下原坚持摩尔根遗传学教学与研究的教授唯心地表示赞成米丘林遗传学，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压抑。施平同志在了解这种情况后经向农业部刘瑞龙副部长请示汇报后，冒着反对米丘林——李森科生物学就是反对苏联的政治风险，从党内到党外，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使从事米丘林遗传学与从事摩尔根遗传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的矛盾得到了缓解。1956年在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后，中央宣传部派于光远同志在青岛举行了遗传学座谈会，施平同志和两个学派的教师代表参加，解决了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的问题，使中国的遗传学走上了科学的轨道。农大在农学系与畜牧系分别成立了遗传学Ⅰ教研组（摩尔根遗传学）与遗传学Ⅱ教研组（米丘林遗传学），为了研究摩尔根遗传学，派了党员教师参加遗传学Ⅰ教研组。毛泽东在上海会见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谈家桢教授（摩尔根的学生）时，还让他成立摩尔根遗传学研究所。

三、施平同志到校后不久，为了摸清教师队伍的“家底”，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对10名一级教授，如著名的植物病理学家戴芳澜、土壤学家李连捷、农药学家黄瑞伦、昆虫学家刘崇乐、家畜寄生虫学家熊大仕等，分别访谈，深感农大有这样一批国际水平的教授极为宝贵，仅次于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这是办好学校最为重要的依靠力量。为贯彻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写了一份长篇报告，提出实行“团结、尊重、照顾、教育”的八字方针，并在思想、工作、生活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真正感到“知识分子的春天”的到来，积极性空前高涨，党与他们之间的凝聚力大大增强。这与1956年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的精神完全一致。但是不幸的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受到极大冲击，特别是在1959年中央庐山会议批判了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后，施平同志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其中一条罪状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投降主义”。

四、在1957年反右派时，施平同志毫无思想准备。开始整风时，他从党内到党外动员全校师生员工大鸣大放，并通过召开各种座谈会，就学校工作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提出批评，及时整改，对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及时说明。在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有些过激的言词在所难免。我当时任校长办公室主任，有的大字报提出在我家里安装了电话是“特殊化”，立即撤掉。施平同志得知后在全校大会上说这是工作的需要，不是“特殊化”，又立即重新装上。有不少大字报提出在评定工资级别时党员偏高。经过党委研究决定对部分党员工资偏高的降一级（我由16级降为17级），受到大家的赞扬。对在“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处理不当的经过调查核实后改正。但是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这是为什么？》和《工人阶级说话了》两篇社论后，使整风形势立即逆转，

开始反右斗争。根据北京市委高校党委的指示，要在教师中树立一位“中右”标兵，虽然在整风鸣放中有过错误言论，还要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右派。施平同志据此参照北京大学将化学系主任傅鹰教授划为“中右”标兵的经验，将工会主席、土壤农化系教授胡秉方划为“中右”，并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宣布。但是不料在向北京市委与高等党校汇报后受到严厉批评，说他“右倾”，要他将胡划为右派。这时他万分为难，不得不唯心地“检讨”自己，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一块心病。在纪念农大建校 90 年返校时多次对这件事表示歉意，使被错划的教师受到感动，能够谅解，更加尊敬。他在离休后写的《六十年春秋风和雨》一书中详细记述了这件事的经过与当时的心情。

五、北京农业大学的校址是原北京大学农学院的旧址，位于西郊罗道庄玉渊潭的东侧，是清末于 1905 年京师大学堂建立的农科大学原址，只有两幢一字与工字二层楼房和一些平房，在附近的恭王寺有一片很小的试验地，对教学研究都受到很大约束。开始在新北京家属宿舍区（现在的翠微路）扩建教学楼，但由于地面太小，很难扩展。施平同志在农业部与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另觅校址。由于在 1952 年院系调整时，森林系划出成立了北京林学院，农业机械系划出成立了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经与两院协商决定三校在昌平共同建校，右为林学院，左为农机学院，中间为农大，并已新建一幢楼房。但由于周边无可作为试验用的土地，经过调研，在昌平北郊农场附近和对面余太君“望儿山”的马连洼选定新校址，除了教学区与生活区外，还有 700 亩的试验站。在建校中，施平同志用了极大的精力与心血，不辞辛劳，除了亲自调查外，经常与建校办公室的同志去北京市规划局、设计院等有关部门商办有关事宜以及解决建筑用“三材”（木材、钢筋、水泥）问题。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终于于 1958 年建成设施齐全的新校，由罗道庄迁入新址，完成了一件大事。为了与中国农科院密切合作，该院的植保研究所、畜牧研究所、新成立的原子能研究所建在学校的附近。

六、新中国成立以后，以俄为师，全面学习苏联，为此聘请大批苏联专家来华指导工作。为此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专家局。北京农业大学在农业教育与科研领域先后聘请了多位专家来校讲学。包括土壤学、作物遗传育种学、作物栽培学、农业昆虫学、植物免疫学、农业化学、果树栽培学、家畜饲养学、家畜病理学、农业气象学、农业物理学、农业经济学等学科。多为教授，少数为副教授。专家来华讲学分为两种，一种是长期为一年至两年，一种是短期为三个月至半年。后者水平高于前者。最早来校的土壤学家涅加诺夫与后来的农业经济学家布拉斯拉维茨曾任校长顾问。为了做好专家工作，从 1953 年毕业留校的优等生中选拔了一批经过培训任专家翻译，成立了专业工作室，开始由施平同志兼任主任，后由党委副书记吴汝焯兼任主任，以后又由我兼任主任。专家工作除了孙晓村校长应接出面外，日常工作均由施平同志直接领导。施平同志向苏联专家详细介绍农大的历史和教师队伍，特别是有一批国际上的知名教授。在他们了解农大的实际情况后，都能与中国教师友好相处，关系良好。每次在期满返国的欢送会上都表示留恋不舍的情感，在返国后还常与相关教师保持联系。由农大聘请苏联专家讲学主要任务是为本校教师与研究生以及全国高等农业院校的教师举办讲习班授课。每位专家来校讲学都要举办一次讲习班，总体来说，教学效果是好的，通过学习交流都有收获，并建立了友谊。在纪念苏联十月革命 40 周年时，编印了《苏联专家在北京农业大学》相册，分发给每位专家。在向苏联学习中，经两国政府商定，北京农业大学与苏联莫斯科捷米里亚夫农学院建立了校际之间的合作，交流经验。施平同志曾在参观全

苏农业展览时访问过该校，带回全部教学法材料，并与校院院长罗查教授保持联系。

孙晓村校长、施平副校长十分重视国际的交往与合作。北京农业大学除与苏联莫斯科捷米里亚席夫农学院建立校际合作外，还与保加利亚索菲亚季米特洛夫农学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北京农业大学每年要接待大批的外国友人。特别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与“十一”国庆节期间，北京农业大学是接待邀请前来参加庆祝活动重要外国代表团重点单位之一。1956年出席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部分兄弟党代表团前来农大参观，了解中国的高等农业教育。对这些代表团，孙、施两位校长都亲自出面接待，介绍情况，陪同参观，宣传了成就，增进了友谊。北京农业大学是首批接受外国留学生的大学之一，有来自越南、朝鲜、蒙古、尼泊尔、伊拉克、喀麦隆等国家的本科生以及波兰、捷克的研究生。学校为他们配备了帮助学习中文与料理生活的中国学生作为“辅导员”，友好相处。施平同志接见他们，鼓励他们勤奋学习，学成回国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贡献。

七、北京农业大学作为全国四大重点大学（北大、清华、师大、农大）之一，必须培养出高质量的科技人才，这就需要不断在学术上有新的建树，在全国高等农业院校中发挥带头作用。为此就必须组织教师开展国民经济发展中重大问题的科学研究。施平同志深感一些国际知名的教授无不在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在农业部支持下，在全国高等农业院校中第一个成立科学研究部，组织领导全校的科学研究工作。施平同志自己兼任科研部主任，娄成后教授、孙渠教授任副主任，调配了专职干部，制订了科研规划，确定了重点研究项目，为学科带头的老教授配备了助手，落实了经费，使科研工作迅速开展起来。为了活跃学术气氛，交流科研成果，于1955年举行了第一次科学研讨会，参加讨论会的除了本校师生外，还有全国兄弟院校的相关学科的教师以及有关部门的相关专家，还有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新闻媒体等，都给以高度评价。我根据讨论的成果写了一篇通讯稿，经施平同志与娄成后、孙渠教授审核后在权威的《科学通报》发表，向科学界作了报道。这次讨论会在北京农业大学的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会后出版了《北京农业大学学报》，施平同志写了发刊词。1956年，施平同志参加了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在毛泽东提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指引下，北京农业大学举行了第二次科学讨论会，农业部刘瑞龙副部长和高教部周建人副部长出席。苏联专家叶尔绍夫等参加。这次讨论会学术气氛更加活跃，成果更加丰硕。

八、1958年在毛泽东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以及超英赶美的目标后，全国掀起“大跃进”热潮，在农村出现了人民公社和粮食放“高产卫星”的报道。这时，施平同志与大家的心情一样兴奋。他还根据市委的决定，兼任农大附近的永丰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作为北京市十个全民所有制公社之一，制订了发展规划。使他未曾想到的是毛泽东在听取了主管教育康生的汇报之后决定北京农业大学和全国其他高等农业院校都下放农村参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解决“脱离生产、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三脱离”问题。8月27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的中央会议上说：“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统统搬到农村去”，并且由中央发了专门文件。在此之前，北京市委大学部通知农大说，康生要去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考察，农大可派人去看他提什么问题好做准备。施平同志派我去农机学院，那天他只看了几个校办工场，提出确定教师的学衔要以粮食产量为准，我返校后向施平同志汇报使他惊讶，但他还是作了充分准备。7月19日康生来到农大搬迁前的罗

道庄旧址只看了土壤农化系的细菌肥料厂和植保系的赤霉素厂，强调评定教师学衔要以粮食产量为准，1000 斤的当五级教授，2000 斤的当四级，3000 斤的当三级，4000 斤的当二级，5000 斤的当一级。强调一个学校要挂五个牌子：学校、工厂、农场、研究所、农林局。在北京市委转达中央决定农大下放后，施平同志连夜召开党委扩大会（总支书记参加）作了传达，讨论如何下放问题。在经过筹划和同有关省联系后确定以系为单位组织全校师生分别下放山西、河南、山东、河北、青海、内蒙古、宁夏和北京郊区。7 月 27 日，农业部刘瑞龙副部长向全校师生员工做报告，提出“咬紧牙关”“过好三关”（群众关、生活关、劳动关），给大家以鼓励。8 月 6 日，施平同志向全校师生员工工作动员报告，传达中央决定，提出四项要求：向农民学习，向基层干部学习；服从当地政府领导；与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建立阶级、群众、劳动、唯物主义四大观点。我留校工作。12 月，留校的党委副书记冯慧德带领我和杨士谋、陈心枚前往河南遂平嵯峨山公社下放队，看到师生在极为艰苦条件下（吃的豆腐渣团子和红薯叶子汤），渡过“三关”，与农民“三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受到农民欢迎。随后，施平同志根据高教部等上级部门的指示，一二年级师生返校上基础课。不料这一措施竟成为 1959 年庐山会议之后他受批判并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定罪之一：执行毛主席下放指示“动摇”，而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他受到难以忍受的打击。以后，由于农业部刘瑞龙副部长的关怀调到农业部宣教局下的业余教育办公室主持工作。1962 年，在新任校长兼党委书记陈漫远主持下，为施平同志彻底平反。在刘副部长去上海任华东农办主任后调施平同志任副主任，直到“文化大革命”我在火车站为施平同志全家送行时既高兴又倍感难过。

九、在施平同志离京赴上海以后很少联系。得知在“文革”中又一次遭到劫难，更感伤痛。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施平同志又一次得到彻底平反，重新工作，先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和上海人大常委副主任，得知这个消息，特别高兴。有几件值得特别怀念的事：

第一，施平同志撰写的《六十年春秋风和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寄给我，让我提出意见，我拜读后甚感亲切，看到施平同志革命的一生。他在来信中说这本书是对青年历史教育的“回忆录”。其中在华东师范大学任党委书记期间有两件事最引人关注。一是为物理系二年级学生王申酉在粉碎“四人帮”后由于曾在毛泽东著作批有不同意见而被认为是“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的冤案以极强的毅力，费了极大的努力，才得以平反昭雪，并要求授予烈士称号。二是经教育部长蒋南翔的同意，华东师大作为全国唯一的高校根据邓小平关于党政分开的指示试行校长负责制的体制改革，经过近两年的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虽然由于在十二大公布新党章后使这项改革搁浅，但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我曾向施平同志建议将这项改革作出全面系统总结，供人们研究。2009 年 5 月，施平同志完成了 3 万多字的《华东师范大学体制改革试点的情况和经验》长篇大作，这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他在结束语中遗憾地说：“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的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未得总结推广，殊甚可惜”。这两件事，充分显示了施平同志强烈的政治责任心和政治勇气，是作为老共产党员最难能可贵的政治品质，是我们以及后人学习的榜样。

第二，我在离休以后，施平同志向我提出两条建议：一是他在一封给我的信中说：“离休是‘自由’

了，是合法的‘自由’，应做自己想做的事，做自己认为能实现自己的最高价值的事，能做平时（在职时）不可能做到的事。总之离休后这段时间是最宝贵的，能对党对人民做出更大更多贡献的时间，要万分珍惜。‘走了’不是什么‘余热’而是几十年积累经验（包括理论）到了成熟的阶段，人生的尖端，自己支配创造性最大的时间，每一分钟都十分宝贵”。他的这种肺腑之言对我是极大的激励。二是他说：“可能的话还要有一个业余爱好，高尚精神生活的爱好”。施平同志这两条建议十分真切和中肯，不仅对我而且适用于所有老同志。他自己的实践又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在出版《六十年春秋风和雨》后，接着把摄影作为高尚精神生活的爱好，从国内到国外，走了多处引人入胜的地方，拍下了珍贵的照片，先后出版了两集由夏征农题字的《施平摄影集》，留下了极为珍奇的历史画面，现在正准备出版第三集。值得特别提到的是自1992年到2010年连续18年，每年元旦、春节时，施平同志与夫人蒋炜同志在自己拍摄的照片上亲笔写上亲切与诚挚的贺年话语，寄给我与孙美莉，令我们十分感动，我一直保存下来，留作纪念。施平同志堪称高超的摄影艺术家。

第三，在北京农业大学期间曾任施平同志秘书的蒋佩华因心脏病突发而不幸去世，施平同志得知这个消息时十分悲痛。他在给我的信中说：“突然收到蒋佩华治丧小组的传真时吓了一跳，没有讣告，只有一份生平和孩子们在送别仪式上的答词。太可惜了，难道真有好人活不长的道理？她在农大做我的秘书，身影还历历在目，而今已永别，白发人送黑发人！怎么能不令我们感伤叹惜。我们不但不能参加送别仪式，连及时给她孩子的慰问信也不能及时发出，而且也不知信寄往何处，因此只好给你附寄此悼唁和慰问的信，请转寄她的子女。”由此看出施平同志对一位晚辈的深厚情谊。

第四，施平同志全家在上海，直接见面机会不多，而在能够见面时感到格外高兴。1995年是北京农业大学校庆90周年，施平同志与蒋炜同志应邀来到北京。10月11日，在三家村饭店原政治课的同志刘炼、罗新、黄惠、付元朔、齐树润、孙美莉、岳林、钟桂云、方梅等与施平、蒋炜同志聚会，十分亲切。刘炼写了16句诗寄怀。10月12日，我陪同施平、蒋炜同志去香山，在“霜叶红于二月花”石碑前留影。2002年8月我与孙美莉前往上海由蒋炜同志带领我们经苏州到无锡华东疗养院看望施平同志，我们一起参观了灵山大佛寺，施平同志带了自拍的相机留下了珍贵的纪念影照。2004年10月12月，我出差无锡，去华东疗养院又一次与施平、蒋炜同志亲切见面，十分高兴。2006年10月13日，施平、蒋炜同志与原北京农业大学吴汝焯、刘仪、张湘琴等在京都苑饭店会面，在参加北京有关活动后于10月24日离京返沪，并在机场与我留影。

施平同志在离休之后仍然十分关心“三农”问题，在我寄去每期的《通讯》，都仔细阅读，并与我在书信中议论一些重大问题。他常说，农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人，又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应向农民学习，关心他们、支持他们、帮助他们，使他们真正富起来。施平同志夫人蒋炜同志曾任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支部书记、校长，后又在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为了庆贺施平同志百岁大寿，特编印了施平与蒋炜同志影照选编、摄影贺年片选和来信选编，以示怀念。

（作者：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本文刊于《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研究文稿》第十七卷，2010年4月28日）

附：

给施平同志的信

郭书田

尊敬的施平同志：您老人家好！我们全家衷心祝愿您老人家 108 岁寿日快乐，全家幸福，贵体健康。俗话说，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您老人家健康高寿，正是不老松而又常青的象征。农大与农业部熟悉您老人家的老同志得知您老人家虽已高龄而身体健康，甚感高兴。

今年是不凡之年，有几个重大节日。一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我国与全球多个国家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中国共产党为马克思故乡树立了一座马克思的铜像，反响甚大。二是《共产党宣言》问世 170 周年，回顾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曲折的历史。三是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正在全国各地举办各种形式纪念活动。改革开放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四是今年还是清末“戊戌变法”120 周年，这个“变法”的六君子遭到残害，而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了有益铺垫，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农村作为突破口，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纪念农村改革 40 周年，在新的戊戌之年，我写了几篇亲身经历改革过程的拙文，编印了《纪念农村改革 40 周年-戊戌献言》，给您寄去一册，请您示教，并作为纪念。

今年 7 月 14 日，农大举行了蔡旭纪念文集与资料采集工程启动仪式，我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发给大家由常州市档案馆编辑出版《小麦人生——蔡旭纪念文集》，收集的资料十分丰富，其中有您于 1985 年 12 月 27 日写给蔡先生夫人王洁的悼念文章。我复印了一份（质量不好）寄给您留作纪念。参加这次会的农大老人不多，有几位与我年龄差不多，见面都很亲切。吴汝焯、张仲威等都因年高未能参加。王步峥身体尚好，他与档案处的同志经过几年的努力，编著了《探索之路——中国农业大学跨越百年的办学历程》，作为《北京高等教育丛书》之一，是一部比较全面而真实的校史。另外，吴汝焯同志在离休之后，集中精力，分赴各地收集史料，编辑印出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农业大学组织史》，按时间编排共三卷（第一卷为 1921—1937 年，第二卷为 1937—1949 年，第三卷为 1949—1992 年），有许多鲜为人知的重要人物与事件。在这两部有关北京农业大学校史与党史中，记载了您在 1953 年至 1959 年任副校长、代校长与党委书记期间经历的在“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农大成为重灾区之一，为保护包括蔡旭先生在内的一批著名农业科学家，而自己深陷苦难之中的过程，能够发挥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作用。

一些熟人向我问起您的情况，我的回答是四个字：“健康老人”，虽已超越百岁，不仅身体健康，更重要的是心态、意志、思维等精神健康，永不衰老。对此既表示仰慕，更表示敬意。德高望重，高山仰止，永远是我们学习的老师。

（作者：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本文刊于《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研究文稿》第二十五卷，2018 年 10 月 8 日）

在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王沪宁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 100 周年，缅怀他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作出的历史贡献，追思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格，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不懈奋斗。

华国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奉献了毕生精力。

华国锋同志 1921 年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一个制革工人家庭。学生时代，他就关心国家前途命运。1937 年七七事变后，他毅然投身抗日运动，1938 年 6 月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走上革命道路，同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华国锋同志先后担任交城县牺盟会秘书，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兼分区农民部部长，中共交城县宣传部部长兼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等职务。他深入煤矿工人和农民、妇女、儿童中发动群众，激发群众抗日热情。他带领精干的武工队到游击区、敌占区打击敌人，建立抗日政权。他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为发展壮大当地抗日武装力量和开展抗日工作作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华国锋同志历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吕梁区第八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阳曲县委书记、晋中区第一地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先后参加了汾孝战役、开栅保卫战、黄崖战斗、古交战斗等。他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精神，领导交城、阳曲等地的土地改革，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使群众踊跃参军支前，为解放古交、太原等城市提供了坚实后勤保障。华国锋同志为山西解放战争胜利和人民政权建立与巩固作出了突出贡献。

1949 年初，华国锋同志随军南下，担任解放后第一任中共湖南省湘阴县委书记。他放手发动群众，开展调查研究，迅速打开了局面，湘阴的支前、建政、剿匪、救灾、土改、生产等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他调到湘潭工作后，历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专员公署专员，中共湘潭地委书记。他结合湘潭地区实际，领导开展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认真总结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经验，在 1955 年召开的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进行了介绍。1956 年后，他先后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湖南省副省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湖

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务。在湖南省领导岗位上，他为全省多方面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重视抓农业生产，特别是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主持兴修了洞庭湖排涝、韶山灌区等大型水利工程。他支持袁隆平同志研究杂交水稻项目，对促进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实现我国水稻生产重大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注意抓工业生产、交通建设，领导了湘黔、枝柳铁路在湖南的会战等重点交通建设项目，使原本基础薄弱的湖南工业生产得到了较大发展，交通建设呈现出崭新面貌。他关注人民群众生活，努力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满腔热情推广农村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在他直接领导下，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取得重大成就。他善于做文化教育和统战工作，热心与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交朋友，注意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注重保护和发展具有湖南地方特色的地方剧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华国锋同志受到冲击并被批斗。恢复工作并担任湖南省党政主要领导职务后，他在困难复杂环境下尽力排除多方面干扰，努力维持全省稳定和生产秩序，保护和解放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知识分子，抓好农业、工业、财贸、文教等工作，使湖南经济避免了较大波动。

1971年初，华国锋同志调中央工作，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之后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国务院工作中，他全力协助周恩来同志，对极左思潮加以纠正，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保障市场供应和物价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华国锋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协助周恩来同志主抓农业工作，使全国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1975年1月，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同年2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确定为常务副总理之一。他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精神，在分管的部门解放了大批干部，适当安排了工作。他注重科学技术工作和高技术人才培养，领导和支持高端国防项目研制攻关工作。周恩来同志逝世后，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同志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76年4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毛泽东同志逝世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摆在党和人民面前。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华国锋同志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赞同和支持。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务。他先后主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他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等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

平反冤假错案，逐步为一部分干部落实政策。他提出要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他的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1980年9月，华国锋同志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至1982年9月。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五大，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特邀代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他仍然关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心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注意调查研究，遵守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他拥护党中央的领导，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华国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将永载史册。

同志们、朋友们！

在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光辉历程中，涌现出一代又一代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优秀共产党人。华国锋同志就是其中的代表，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纪念华国锋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党性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华国锋同志党性原则强，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他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讲党性、顾大局，发扬民主，遵守纪律”。他是这样要求的，也带头这样做。在“文化大革命”的艰难环境中，他坚持“在党内要讲党性，不能讲派性，不允许在党支部内搞派性”。面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妄图篡党夺权的危险局面，他毅然表示，“历史把我推到这个位置，我必须不计个人安危，勇敢担当起来”。新时期完成历史转折后，他自觉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

不论时代如何发展、条件如何变化，对党忠诚始终是第一位的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我们纪念华国锋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坚守初心、心系人民的深厚情怀。华国锋同志说过：“我们共产党干部，就是要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对于不利于人民的一切缺点错误、歪风邪气，都要敢于彻底揭露，坚决改正。”解放初期他刚到湖南工作时，就在湘阴县领导建立了第一批农村卫生所，培训了湘阴第一代医生，充实发展了县人民医院。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他立即组织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研究实施了一系列抗震救灾措施。他亲临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慰问灾区群众，转达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关怀，鼓励灾区人民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之后，他又多次视察地震灾区，了解灾后居民住房生活等情况，调动各方面因素加快灾后重建步伐。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广大党员、干部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时刻关注人民安危冷暖，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不断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我们纪念华国锋同志，就是要学习他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华国锋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工作扎实，作风务实。“大跃进”中，面对虚报、浮夸等不良风气和相互攀比、盲目追求高产的做法，他凭着自己多年基层工作经验和深入各地实际了解到的情况，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谈自己对当时形势的看法，说：田瘦了，牛瘦了，人瘦了，产量不可能那么高了。他实事求是反映问题的态度受到毛泽东同志肯定和赞扬。毛泽东同志后来评价他“讲老实话，是老实人”。他重视农业生产，强调科学种田的重要性，对推动农业机械化、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粉碎“四人帮”后，他支持经济理论界开展的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肯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应该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他认为，“一定要学习外国的好经验，其中包括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经营管理经验，开展广泛的经济合作”。

新征程上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广大党员、干部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强化责任担当，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敢于直面问题，务求工作实效，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关于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效。

——我们纪念华国锋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光明磊落、清廉自律的高尚品质。华国锋同志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我们能为民族为人民在民族命运转折的斗争中做出努力就好。但还不够，年老了要保持晚节，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的好传统。”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俭朴，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持修身律己、慎终如始，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慎友，带头廉洁治家，带头反对特权，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节操，做一个一尘不染的人。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党今天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凝聚着老一辈革命家的心血和奋斗，都承载着老一辈革命家的嘱托和期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攻坚克难，开拓创新，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努力创造更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辈的新业绩，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来源：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人民日报》2021年02月21日02版）

回忆与华国锋同志直接接触的几件事

郭书田

最近国外有的媒体传言一些华国锋的事，是否属实，难以辨识。但是他作为党与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即曾任党中央主席与国务院总理，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关键作用，是不容否认的。他在任职期间也做了许多有益的事，为人老实忠厚，也是大家认可的。我与他有四次直接接触，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是1975年9月15日至10月19日，由中共中央在山西省昔阳县与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他与邓小平、江青出席，这是在邓小平复职提出“整顿治理”的举措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涉及如开展农业学大寨的诸多政策问题。当时作为工作人员在文件材料组参加了这次会议。直接向他汇报了代表们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如学大寨中“割资本主义尾巴”，大队核算，标兵工分等，他认真地听，并作了笔记，给人以平易近人能够接近的印象。

第二次是他率领代表团赴南斯拉夫考察农工商联合企业的经验，其中有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参加。返国后于1978年9月22日至28日二里沟新疆办事处召开了研究如何学习的问题，我作为农垦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负责人之一参加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计委、财政、粮食、商业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他们认为在现行体制下，南斯拉夫的经验是学不了的。赵紫阳提出在四川省选择三个县（广汉、邛崃、若尔盖）试点，成功与不成功全由他负责，但要求中央有关部门不得干预。华当即表示同意。（会后我曾去四川若尔盖作过调查，当地的有关部门反对十分强烈，农民自产的水果到市场出售，被工商管理部门把秤砸断）回京后，写了报告，曾向陈俊生、田纪云、华国锋作了报告。由于阻力甚大，他认为农垦系统国营农场有实行农工商一体化的基础与条件，让农林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于1979年5月23日至6月13日率领代表团赴南斯拉夫学习考察，我参加了这次考察，在6个加盟共和国中看了4个，接待代表团的南农委主任尼迈里说。农业不搞加工与流通永远处于殖民地地位，十分深刻。回国后，写了考察报告送给华国锋，并提出召开会议在农垦系统执行，华立即同意，会议产生了由我起草的纪要，华批示同意以国务院名义于1979年7月发了“183号文”在农场推行，受到农场的欢迎。

第三次，在粉碎“四人帮”后，由于农垦系统遭受到的破坏特别严重，急需整顿治理，经华国锋批准召开了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他还为会议题字“国营农场潜力很大，一定要把农场办好”。会议产生了由我起草的纪要报国务院，经华批准，于1978年2月发了国务院20号文件，受到农场的欢迎。

第四次，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亦称普及大寨县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背景下召开的，并未摆脱“左”的影响，仍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学大寨中曾经出现扩大核算单位、限制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等错误，在一些地区抬头回潮。这次会自始至终由华主持。我亲自听取了代表们在小组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并直接向他汇报了“左”的思想回潮问题，他能听得进去，未说一句给以批评的话，给我的印象是他并不赞成“左”的思想回潮，但是他赞成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生产大队的主张，曾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发了1976年49号文件，提出过渡的具体指标，由于反对呼声强烈，被人们称为“穷过渡”，实际未予执行。

华国锋后期被批评为反对邓小平复职和提出“两个凡是”的主张，据他解释不是反对，而是有一个“批邓”的思想转弯问题。也应实事求是予以评判。

（作者：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2018年8月7日）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两个关键、四个招数

唐仁健

最近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已经“十二连快”的农民收入增长也面临下行压力。今年上半年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 8.9%，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6.7%。这是 2004 年以来实际增长幅度最小的一年，前 12 年同期实际增幅都在 8% 以上，而今年首次掉到了 7% 以下。这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信号。在农民工就业趋紧、农产品价格低迷的形势下，如何为农民持续增收找到新动力？

带着这一问题，日前我们到山东省，以潍坊市、济南市为重点就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及其对农民增收的效果作了调研。我们先后到潍坊市的寿光市、寒亭区、峡山区、青州市考察了种业研发中心、中百大厨房、大棚生产区、花卉产业园、农业科技孵化器，到济南市的章丘市考察了基层供销社、现代农业园，同乡村干部、农民群众、企业经营者进行了座谈，与山东省委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进行了交流。总体感受是，山东省把培植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举措，构建农业与二三产业跨界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激发了农村发展活力，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益，实实在在开辟了农民增收的新途径。

一、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四个招数

建在潍坊市“中国食品谷”的“中百大厨房”是三产融合发展的一个范例。走入“中百大厨房”的车间，映入眼帘的是一箱箱经过清洗包装准备外运的水果、蔬菜，几条流水线正在分别加工各种熟食和面点。这个 6 万平方米包括蔬菜、水果、干货、熟食、面点、豆制品的加工区，上游联着潍坊各县市区及周边县市 37 个蔬菜基地和全国各地的 29 个水果基地，下游靠着 600 多家直营、连锁店和“宅配套餐”网上配送、佳乐家商城农产品的网上销售。类似这样的企业，在潍坊市还有十多家。

这是山东省培育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的一个缩影。近两年来，山东省以农业为依托，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制度、技术、商业模式创新为动力，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催生了许多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省里同志介绍，他们在这方面的招数主要有 4 个。

一是坚持“三链重构”，引领“新六产”发展。山东省致力于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三链重构”，就是产业链相加，着眼点是产业化升级，即第一产业接二连三，向后延伸；第二产业接一连三，双向延伸；第三产业接二连一，向前延伸。价值链相乘，着力点是提质增效增收，即一产的一份收入，

通过二产增值为两份收入，再形成三产的三倍效益。供应链相通，着力点是降成本、增活力、可持续，即产销直接对接，减少流通环节，节约流通成本。

二是突出“两个亮点”，激活“新六产”发展。亮点就是农村电商和乡村旅游。目前，全省已有40个县签约运行农村淘宝项目，建设村级服务站1500多个。去年全省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规模约为450亿元，增长30%以上。乡村旅游显示火爆态势，今年上半年实现乡村旅游收入950亿元，同比增长29%。经营业户6.4万户，吸纳安置就业31.5万人。

三是依托“三大载体”，带动“新六产”发展。就是通过美丽乡村、特色小镇、农业园区，集聚一二三产业融合的要素。目前，全省有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81个。

四是做强“三大主体”，撬动“新六产”发展。目前，全省家庭农场发展到4.7万家，农民合作社15.9万家，规模以上龙头企业9300多家，新型经营主体发挥了“先吃螃蟹”的引领作用。同时，山东省在财政投入、土地流转、金融创新、科技支撑、农民培训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为打造农村新产业新业态营造环境、提供助力。

二、农村产业融合的两个关键和四种形态

山东同志常讲，山东农业看潍坊。潍坊市农业总产值居全省之首，蔬菜、肉类出口分别占全国1/10和1/8。潍坊市还是一个农业出经验的地方，上世纪90年代就在全中国率先孕育了农业产业化雏形，经久不衰的寿光蔬菜大棚更是闻名遐迩。如今潍坊市培育新产业新业态的实践，让我们体会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紧紧扭住“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升值”这两个关键。

“全环节升级”，就是用新理念、新技术、新装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在土、肥、水、种、药等各环节和生产、加工、销售等全过程，注入现代经营、科技和管理要素，使传统产业脱胎换骨。寿光市的蔬菜产业就是范例，从土壤到大棚，都在改造提升。过去大棚土壤由于过量施肥和常年连作等原因，出现了有机质含量降低、次生盐渍化和土传病害加重等现象。从2011年开始，寿光市投入4000万元，通过大力推广微生物菌肥、高碳有机肥、水肥一体化、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对第一轮需要改良的28万亩土壤，全部进行了改良。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了0.8个百分点以上、蔬菜产量增加了10%以上；施肥平均减少了40%以上、施药平均减少了25%以上、用水减少了50%以上，实现了节水、节肥、节药和增效。今年寿光市开展大田改大棚、旧棚改新棚的“两改”工作。目前，已完工“两改”1.8万亩，大棚2600多个。相较于传统大棚，第五代新式大棚面积大了，棚架高了，围墙薄了，土层低了，采光更好了，通风更畅了，设备也更先进了。土地利用率、劳动生产率都得到了提高，蔬菜的产量和质量也随之提升。

“全链条升值”，就是一二三产业的三个链条在融合发展中同步得到升值，而不是一产的初级产品到二产链条才升值，二产的加工产品到了三产链条才升值，这样才可能实现三次产业在融合中形成纵向的一体化发展，也才能够使农民群众更多地分享二三产业增值的收益。怎么做到全链条增值呢？我们在潍

坊市峡山区的优渥有机农业有限公司找到答案。优渥公司是一家 IT 公司转型发展有机农业的新型经营主体。项目规划建设 5000 亩有机蔬菜、有机水稻种植示范区，现已建成 600 亩，其中有机认证 400 亩、有机认证蔬菜 94 种，通过了美国 (USDA)、加拿大 (CAAQ) 的有机认证。他们做到了三个链条都增值。首先是种什么？种有机蔬菜和大米，即使单卖这些初级产品也比普通产品值钱；其次是加工什么？就是把初级有机产品加工成食材，加工中得到增值。然后是卖什么？他们打造“有机汇”这个市场品牌，通过会员制这个渠道，向客户提供“家庭有机食材一站式服务”，卖的是品牌，也是服务，增值效果十分明显。“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升值”相融相促，“全环节升级”是基础，“全链条升值”是目标。

我们进一步思考，产业融合以什么样产业形态来体现？结合在潍坊等地的调研，我们初步感到目前至少有终端型、体验型、循环型、智慧型，这四种产业形态已经破土而出，成为产业融合的有效载体。

终端型，就是以农产品终端消费需求为导向，逆向安排一二三产业全过程，使农业生产、加工、配送各环节都契合消费需求。中百大厨房、优渥有机公司就实现了农产品从田头到餐桌、从初级产品到终端消费的无缝对接。

体验型，就是挖掘和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消费者通过旅游观光、休闲养生、社会实践、农耕文化教育等，实现参与式体验。山东省的大批农家乐、采摘园、开心农场等就是这种体验场所。

循环型，也可以说是生态型。目前，有的地方以循环农业作为产业融合的渠道，推进各种农业资源往复与高效流动，达到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与提高经济效益的多重作用。

智慧型，就是把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传感器等现代信息技术引入到农业生产、加工、营销各环节，对全过程实施智能感知、预警、分析、决策和控制。在寿光市潘家稻庄，我们就参观了一座座“智慧蔬菜大棚”，一整套的智能化设施，实时监测着湿度、温度、光照、通风等变化状况，进行着自动灌溉、降温、通风、施肥等照料活动，大棚的主人只用一台手机就可以远程操作，大大节省了人工人力和劳动时间。

当然，以上四种产业融合形态，总体上是依据各自生产形式、产业功能而初步划分的，在基层的丰富实践中，既有单一产业形态，也有混合形态，我们考察的潍坊市的青州(国际)花卉产业园以及济南市的章丘现代农业示范园，就既具有休闲体验观光的性能，也在提供销售花卉和食品等终端产品，可以说是终端型与体验型的全面融合。

三、要为产业融合发展定好位、号准脉、加把力

通过在潍坊、济南两市实地调查新产业、新业态发展情况，我们感到有这样几点启示。

一要在战略上把产业融合发展“定好位”。从山东省抓产业融合发展的势头和农民群众对新产业新业态的劲头来看，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可能会催生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又一次历史性变革。我

们感到，这也许是继“大包干”、乡镇企业、农民工进城之后，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极有可能再次给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强大动力，使农业农村真正成为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从长远看，如雨后天春笋般破土而出、茁壮成长的产业融合发展，是否能够同样创造历史奇迹，需要今后进一步观察和研判。但从眼下看，已经在各地农村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新产业新业态，确实能使要素在工农、城乡和产业间高效配置，产业链、价值链在融合中纵横延伸，农业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和组织方式发生深刻转变，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新动能、开辟新空间。其中使人眼前一亮的是，三产融合对农民增收效果明显，直接体现到经营净收入增长上。潍坊市今年一季度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5222 元，其中工资性收入仅增长 4.4%，而经营净收入则增长了 19.9%（远高于全国同期 9.2% 的水平），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这些年来，农民增收很大程度靠工资性收入的较快增长，在当下农民工就业趋紧、农民收入面临下行压力的形势下，产业融合发展正在成为农民增收的一个新增长点。正如一位基层干部所说，产业融合发展，很可能成为破解农民增收难的“金钥匙”。我们要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把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培育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作为推进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重大战略举措。

二要在战术上为产业融合发展“号准脉”。孕育农村产业化雏形的潍坊市，如今又在农村产业融合上做的风生水起。那么，产业融合与我们以前常说的农业产业化区别是什么，到底什么关系？我们感到，产业融合与农业产业化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两种形态。做个简单的比喻，产业化是把三次产业这三个“鸡蛋”放在一个盆里，你挨着我、我连着他，形成联动发展；产业融合是不仅把三个“鸡蛋”放在一个盆里，并且还要打碎、搅匀，使它们完全融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他，形成融合发展。因此，产业融合是产业之间的高度融合，不是简单结合，是有机交融，不是一般交集。这个道理，我们是从基层和群众实践中体味到，今后也似有必要向更多的干部群众讲清楚，不能把产业融合简单当作农业产业化的“再印版”，而是要作为农业产业化的“升级版”。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进一步认识产业融合的内涵与外延。从边界上看，融合就很难分清产业间原有的界线，很难分清哪个是农业、哪个是工业、哪个是服务业，三次产业在交融中是似无似有、共存共有，这就是为什么把产业融合发展叫做“第六产业”的道理。从时序上看，没有分三个时段和先后顺序，很难分清哪个时段搞生产，哪个时段搞加工，往往是三产同时起步、同时演进。从空间上看，融合使要素绑在一起，集聚度相当高，很难分清哪个区域搞种植养殖，哪个地块进行加工销售，有时生产场所也是加工车间，还是销售平台。从关系上看，三产互为依托、互为因果，哪一产的发展都以对方存在为必要条件，否则效果便大打折扣。

促进产业融合健康发展，有一个谁来干、谁当主角的问题，也要弄清把准。产业融合发展效益高、前景好，工商资本有积极性。目前看，不少工商资本和社会资金已经进入这个领域，并取得初步成果。产业融合离不开工商资本的参与甚至发挥引路作用，但是从我国具体国情农情出发，需要明确，产业融

合发展更应由农民群众自己干、当主角，要让农民更多地直接创造和分享产业链、价值链的升值收益。农民自己怎么干？要培育多元化的经营主体，核心是家庭农场、合作社以及农民参与入股的龙头企业等。产业融合要有一定的组织化程度作保障，一家一户有时很难干成。从山东的经验可以看到，合作社是带领群众进入产业融合领域最有效的组织形式，产业融合需要一定规模的土地，土地合作社就派上用场。需要资金支持，办在合作社的资金互助组织就能发挥作用。

三要在政策上为产业融合发展“加把力”。从调研情况看，加快培育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也是新形势下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的新动力。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是在“互联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生事物，虽然各地都涌现出了一批典型，预示着美好光明的前景，但要把这些美丽的盆景变为亮丽的风景，使星星之火燎原广袤的农村，还需要各类创业、经营主体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破浪前行，也需要各级政府为之加油助力。政府要干的并不是“建温室”“造盆景”，而是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公平的竞争环境，让在农村创新创业的企业享受到在城市一样的政策，解决好用地、融资、人才、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急难之所。

第一，解决用地难题。长期以来，年度建设用地指标很难下到农村，农村土地整理、村庄整治出来的建设用地，也通过“增减挂钩”指标进了城，形成了农村的地农村很难用的怪圈。新产业新业态项目，要在农村落地，首先要解决建设用地问题。可以考虑，将年度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确定一定比例，专项用于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同时，允许村庄整治、宅基地整理等节约的农村建设用地，通过土地入股、公开转让方式优先保障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用地。

第二，解决融资难题。这是在农村创业、办企业遇到的老大难问题，根子在缺少有效抵押物。可以考虑，通过各级政府支持的“三农”融资担保体系，或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通过设立基金、贴息、担保等途径，解决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融资问题。

第三，解决人才难题。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产业融合，需要大量的跨界人才，迫切要求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当务之急，要加快创新人才培养体制，完善技能培训机制，解决培训与需求“两张皮”的问题，逐步使企业成为技能培训的主体，政府通过购买服务、事后补助等办法给予一定支持。

第四，解决基础设施问题。乡村旅游和农村电商是目前最具活力的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对农民增收效果非常明显。可以考虑，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扶持力度，让这两个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得更快些。例如，研究在重点乡村旅游区实施免费 Wi-Fi(无线联网)工程，进一步推进宽带进农村、进景区工作，参考一些地区的做法和经验，在“宽带中国”的战略框架内，在重点乡村旅游区加快建设无线联网设施，向乡村旅游者提供免费 Wi-Fi。

(作者：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2020年12月18日)

粮食安全观

杜 鹰

当前讨论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一是我国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美国对我国全面打压阻遏升级，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必须做好应对严峻挑战和复杂局面的充分准备；二是我国即将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的新征程，现代化建设正处在关键时期，我们既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要做好六保六稳工作，比任何时候都要注意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三是经过多年的粮食丰产之后，我国粮食供求出现一些阶段性的变化，结构性矛盾日显突出，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开始显现，需要我们给予高度关注。粮食安全是维护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最重要的压舱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不断提高粮食安全保障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我国保障粮食安全取得的主要成就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1983 年发布了新的粮食安全定义，即：“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所需要的基本食品”。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可得性，即社会要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二是可及性，即所有人要能够买得起粮食。可见，粮食安全是一个既包括生产与供给，又包括分配与消费的完整概念。

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始终把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经过 70 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尤其是经过 40 多年改革开放的沧桑巨变，中国不仅成功地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用全球 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生产了全球 1/4 的粮食，养活了全球近 1/5 的人口，而且实现了由“吃不饱”到“吃得饱”、由“吃得饱”到“吃得好、吃得安全”的历史性转变，在保障粮食安全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一是粮食产量稳步增长。粮食总产从 1978 年的 3.05 亿吨增长到 2019 年的 6.64 亿吨，增长了 1.18 倍，年均增长 1.92%；自 2012 年突破 6 亿吨、2015 年超过 6.6 亿吨以后，连续 5 年稳定在 6.5 亿吨以上水平（参见图 1）。粮食单产从 1978 年的 337 斤/亩提高到 2019 年的 763 斤/亩，增长 1.26 倍；2017 年，我国稻谷、小麦、玉米的单产比世界平均水平分别高 50.1%、55.2%和 6.2%。人均粮食占有量从 1978 年的 316.6 公斤提高到 2019 年的 474.2 公斤，整整提高了 50%，稳定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二是营养状况明显改善。首先是膳食品种丰富多样。2019 年我国人均主要农产品占有量及相当于 1978 年的倍数：油料是 24.95 公斤和 4.6 倍；糖料是 86.92 公斤和 3.51 倍；猪牛羊肉是 38.64 公斤和 3.35 倍；牛奶是 22.87 公斤和 24.93 倍；水产品是 46.29 公斤和 9.57 倍；水果是 195.71 公斤和 15.62

倍；蔬菜是 595.29 公斤，相当于 1995 年的 2.8 倍（参见表 1）。其次是营养水平改善。据国家卫健委监测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平均每标准人日能量摄入量 2172 千卡，蛋白质 65 克，脂肪 80 克，碳水化合物 301 克，能量和营养素供给充足。

三是“买得起”问题总体解决。1978-2019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343.4 元提高到 42358.8 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 7.17%，恩格尔系数从 57.5% 下降到 27.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33.6 元提高到 16020.7 元，年均增长 7.67%，恩格尔系数从 67.7% 下降到 30.0%（参见图 2）。从减贫角度看，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农村有 2/3 的人口吃不饱肚子，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绝大多数农村人口稳定地越过了温饱线；1986 年我国正式启动扶贫开发，按当时的标准，贫困人口 1.31 亿人，到 2007 年减少到 1479 万人；按现行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 2010 年的 16547 万人减少到 2019 年底的 551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17.2% 下降到 0.6%。到 2020 年底，绝对贫困将历史性地得到解决。

四是粮食储备能力显著增强。目前，我国共有标准粮食仓库仓容 6.7 亿吨，简易仓容 2.4 亿吨，足足可以装下一年的产量；全国粮食物流总量接近 5 亿吨，其中有近一半为跨省流量，粮食区域间调配能力显著增强；政府粮食储备充足，远高于国际储备量占消费量 17% 的安全线，且在全国大中城市均建立了 10~15 天的应急成品粮储备，具备应对重大灾害和公共突发事件的能力。

中国在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为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打下坚实基础，也为全球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要点

在长期的实践中，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形成了一整套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理念、战略、政策和做法，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这一战略的要点是：

第一，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的粮食安全方针。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消费国。尽管中国的农业资源禀赋欠佳，人均农业资源相对匮乏，但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不能寄希望于国际市场。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出于战略考量，不能受制于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握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靠别人解决吃饭问题是靠不住的，如果口粮依赖进口，我们就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二是国际贸易量有限。全球粮食贸易量约 2.5~3 亿吨，不到我国粮食消费量的一半，其中大米贸易量 3500~4000 万吨，仅相当国内消费量的 1/4。三是出于外交考虑。我国进口粮食具有“大国效应”，一旦大量从国际市场采购粮食，势必引起国际粮价大幅上涨，不仅要付出高昂代价，而且会影响我国与一些缺粮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目前全球 8.2 亿饥饿人口主要集中在这些国家。四是出于国内的考虑。目前我国农业就业人口仍有 1.94 亿人，过多进口粮食，会冲击国内的粮食生产和就业。我国小麦、水稻、玉米的单产水平分别是单产排在前十位国家平均水平的 60%、71% 和 67%，粮食增产仍有潜力。

粮食自给率是衡量粮食安全的主要指标。1996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召开世界首脑粮食峰会前夕，

我国发布第一部《粮食白皮书》，提出我国的粮食自给率要保持在 95% 以上。后来，随着人们膳食结构改善和蛋白饲料的需求增长，大豆进口量逐年递增，特别是入世后，2004 年我国从农产品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必须根据新的情况有取有舍。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重新定义了粮食安全的内涵，进一步明确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优先序，指出粮食安全的核心是口粮安全，在粮食中要重点保谷物基本自给，在谷物中要确保口粮绝对安全；明确了粮食安全的根基是能力安全，这包括“三个能力”，即：国内可持续的综合生产能力、必要的储备能力，以及对国际资源的掌控能力，要求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着眼点放到能力建设上来。

第二，坚持不懈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主要是靠三条：一是藏粮于地。前提是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同时加强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近 15 年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只有两个年度减产，减产幅度不超过 2%，打破了以往“两增一减一平”的怪圈，主要得益于基础设施保障能力不断增强。二是藏粮于技。中国增加粮食总产量，主要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2019 年比 1978 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减少 6800 万亩，但产量却翻了一番多，主要靠单产的提高。提高单产，主要靠良种良法，靠科技进步。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粮食生产的良种覆盖率、科技进步率、栽培管理水平、综合机械化率都上了一个大台阶，今后仍然要坚持走科技兴农、内涵发展的路子。三是优化区域布局。不同农产品在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优化农业生产布局，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2016 年以来，我国在划定和建设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推动优势农产品向优势产区集中，使农业资源配置效率得到进一步提升。

第三，保护和调动种粮抓粮积极性。主要是“三个积极性”。一是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家庭承包制的确立，本身就是最大的激励机制。进入新世纪以来，继取消农业税后，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实施生产者补贴，建立最低价收购制度，加强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保护和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二是调动农业科技人员积极性。我国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体系较为完整的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队伍。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激励农业科研人员创新的举措，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实行人员聘用制度；搭建科研成果交易平台，开展科研成果权益分享改革试点；在强化公益性职能的同时，放活经营性服务，允许科研人员和技术推广人员自主创业、持股兼职，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三是调动地方政府抓粮的积极性。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国即建立粮食省长负责制。为了解决“产粮大县、经济小县、财政穷县”问题，中央财政从 2005 年开始实施产粮大县激励政策，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同时取消产粮大县粮食风险金、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地方配套。探索建立对粮食产销区利益补偿机制。

第四，健全粮食储备制度，畅通粮食市场流通。一是在储备方面。管好用好“天下粮仓”，对于调节丰欠、平抑物价、保证市场供应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不断完善粮食储备体系，逐步建立起政府储备与企业储备功能互补、中央储备与地方储备各负其责、政策性业务与经营性业务相互分离、储备规模结构比较合理、运行机制较为完善的国家粮食储

备体系。二是在市场流通方面。我国粮食流通经历了从统购统销、调拨包干到多渠道流通，再到粮食购销市场化的转变历程。目前，全国共有粮食购销主体近 10 万家，粮食加工企业几十万家，从粮食购销到加工转化基本实现了市场调节。三是在市场体系建设方面。我国建立了从现货市场到期货市场、从批发市场到线上交易、市场类型齐全、交易方式多样的市场体系和四通八达的粮食物流体系，粮食流通、储备、加工的装备水平、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第五，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了弥补国内资源短缺、缓解资源环境压力、调剂品种和丰欠余缺，我国从国际市场适度进口农产品是必要的，也有利于我们腾出宝贵的农业资源，集中力量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和口粮绝对安全。一是把好进口关。我国入世后，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对谷物进口实行配额管理，配额内进口实行低关税，配额外进口实行高关税；大豆实行单一关税管理，税率 3%。我国目前每年净进口农产品 500 亿美元左右，其中大米、小麦、玉米有进有出，净进口较多的是大豆，约占进口农产品总额的 80%。二是积极稳妥推进农业走出去。自 2007 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提出农业走出去以来，特别是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农业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海外农业合作、投资、并购日趋活跃，合作领域从种养业拓展到农业全产业链。比如，中粮集团收购了荷兰的尼德拉和香港的来宝集团，强化了在全球的粮食加工、物流、仓储和贸易网络布局；又比如，中化集团先后收购瑞士先正达和以色列安道麦公司，成为全球最大的农药生产公司和仅次于孟山都、杜邦先锋的第三大种业公司，产业链和研发基地覆盖 130 多个国家。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美国对我国全面打压阻遏、国内玉米小麦价格上涨、夏粮收购进度偏慢，再加上个别人误读制止餐饮浪费，社会各界对粮食安全问题格外关注。那么，当前我国的粮食安全状况如何，这是首先需要澄清的。

从粮食供求角度看，总的判断可以讲两句话，一句话是总量基本平衡，另一句话是结构性矛盾突出。分品种看，小麦、稻谷作为口粮，可确保绝对安全。在供需关系上，我国小麦每年的消费量约 2400~2500 亿斤，近三年的平均产量为 2600~2700 亿斤；稻谷每年消费量 4000 亿斤左右，近三年的平均产量为 4200 亿斤；从库存看，小麦、稻谷的国家库存充裕，小麦库存够一年的开支，稻谷库存够 8 个月的开支，保证市场供应是没有问题的。大豆是恒定要进口的，2019 年更多从巴西、阿根廷进口，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已恢复从美进口。现在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玉米，我们说粮食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眼下主要是指玉米。

玉米的供求关系正在从前几年的过剩转为短缺。4 年前，我国玉米库存高达 2.5 亿吨，明显供大于求。为了解决阶段性供大于求问题，2016 年，国家取消了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同时调减“镰刀湾”地区玉米种植面积，玉米产量连续 4 年减产。与此同时，玉米的加工转化市场活跃，饲料行业由弱转强，淀粉加工总体扩张，特别是玉米燃料乙醇加工转化能力扩张较快。在供需关系此消彼长的带动下，玉米去库存的速度比预想的要快。随着供需缺口扩大和库存数量下降，2020 年以来，东北、华北、华南地区玉米的市场价格从 2019 年底的 1700~1800 元/吨上涨到 2200~2400 元/吨。由于玉米价格上涨，玉米、

小麦价格倒挂，一些饲料企业宁愿采购小麦做原料，又拉动了小麦价格的上涨。今年夏粮收购进度放缓，与农民存在惜售心理有直接的关系。

上述情况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正在采取措施。应该说做好当前玉米的保供稳价工作是有基础、有条件的。2020 年全国玉米播种面积 6.23 亿亩，比 2019 年扩大了 0.6%，尽管产量会受台风、草地贪夜蛾病虫害的影响，但影响程度有限，预计今年玉米产量在去年增产的基础上基本持平。近期，为保障市场供应，进口足够的玉米是有保障的，再加上国家储备，以及国家有关部门已着手控制玉米燃料乙醇产能扩张和转化节奏，玉米供求恢复平衡是可以预期的，近期玉米价格已经开始企稳。

从中长期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主要是：

需求刚性增长，资源约束趋紧。影响粮食消费需求趋势的主要是两个变量：一个是人口增长。预计未来 10 年我国每年新增人口 500 多万人，到 2030 年达到峰值的 14.5 亿人。再一个是消费升级。“十四五”期间，我国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每年新增城镇人口 1000 多万人，带动消费进一步升级。由于人口增加和消费结构升级，预计到 2030 年前后，我国的谷物需求将达到峰值的 7.1 亿吨，即每年需增产 100 多亿斤。其中，口粮消费稳中略增，新增需求主要集中在饲料粮上。另一方面，进一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在耕地方面，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我国现有 18 多亿亩耕地将继续减少，“占优补劣”的问题更加突出；在水资源方面，城镇、工业、生态用水需求增加，农业用水空间缩小；在基础设施方面，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欠账较多，抗灾减灾能力不强，到 2022 年完成 10 亿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存在资金缺口；在技术进步方面，在较高单产水平上进一步突破新品种和新技术的难度越来越大，种业发展仍然存在投入不足、创新能力不强、低水平同质化竞争问题，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机械化率存在水稻播种、山地机械化等方面的短板。总体上讲，我国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供求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

结构性矛盾突出，质量安全存在隐患。一是从品种结构看，稻谷产大于需，仓储稻谷有待消化；小麦产需平衡有余，但专用优质小麦供给不足，每年均需进口几百万吨；玉米产需长期趋紧，要保持 90% 以上的自给率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大豆目前对外依存度超过 80%，产需缺口有进一步扩大趋势。二是从区域结构看，粮食产销区不平衡矛盾进一步加剧。13 个粮食主产省中，粮食净调出省已减少到 6 个；11 个产销平衡省中，有 9 个省粮食自给率从 2003 年平均的 97% 下降到现在的 58%；7 个主销区省粮食平均自给率从本世纪初的 61% 快速下滑到目前的 24%，粮食主产区增产压力越来越大，同时也对粮食的流通和储备提出了新的要求。三是从品质质量看，我国粮食生产始终存在数量与质量的矛盾，提高复种指数、使用高产品种、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等，尽管提高了单产水平，但同时也造成粮食的品质质量不高，还给生态环境安全带来隐患。总体上看，我国粮食品种大路货多，优质、专用、绿色产品少，初加工产品多，精深加工产品少，不能满足消费升级和多样化的需求。

生产成本高企，比较效益下降。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三种粮食的亩均总成本呈加快上升趋势，其中又尤以 1990-1997 年、2004-2014 年两个阶段上升速度最快。2004-2014 年，我国三种粮食亩均总

成本从 395 元上升到 1069 元，增加了 1.71 倍，年均增速高达 10.5%，其中，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年均增速分别达到 12.2%和 14.2%，是总成本加速上升的主要推手。与美国横向比较，我国小麦、玉米、水稻单位面积生产成本分别于 1995 年、2011 年和 2013 年超过美国。2015 年，我国三种粮食的亩均用工量 5.61 个，日均工价 79.7 元，亩均人工成本 447.2 元；而美国每亩用工量仅 0.38 个小时，尽管日均工价 849 元，是我们的 10 倍之多，但亩均人工成本 322.6 元，比我们还低 27.9%。2014 年以后，我国三种粮食价格均超过国际市场，为解决价格倒挂造成的“产量增加、进口增加、库存增加”的扭曲，国家启动重要农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先后取消了棉花、油料、糖料、玉米的临储政策，调整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实行生产者补贴。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三种粮食的收购价格总体上呈下行趋势，而亩均成本仍在高位上缓慢上升，结果导致亩均收益明显下降。2019 年，我国三种粮食的亩均产值 999.1 元，比 2015 年下降了 10%，总成本上升了 1%，亩均净收益除水稻微利外，小麦、玉米、大豆等均由正转负。近两年来，各地均反映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甚至个别地方出现抛荒现象。这些趋向性、苗头性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谨防出现粮食生产滑坡，一旦出现滑坡，几年都扭转不过来。

国际贸易不确定性增加，支持保护政策有待完善。有研究表明，我国要保证农产品的供求平衡，至少需要 35 亿亩农作物种植面积，而目前国内能提供的农作物种植面积只有 25 亿亩，也就是说，约有相当 10 亿亩种植面积的农产品需要进口，其中仅大豆进口折面积的缺口就有 5 亿亩。这决定了中国的农业一定是国际开放体系中的农业，中国的粮食安全也必须在开放体系中统筹考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从近期看，开放条件下的粮食安全在两个方面面临挑战。一是利用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以及疫情防控转为常态化趋势，各国增加粮食储备的倾向抬头，提高了国际粮食贸易的成本并带来不确定性；中美经贸摩擦同样抬高了进口成本，同时造成国内生产者和行业从业人员预期的不稳定以及大豆及玉米种植面积的波动。二是如何平衡国内农业支持政策与国际规则。一方面，由于资源禀赋的原因，我国农业的基础竞争力先天不足，有必要加强国内支持保护；另一方面，WTO 将政府提供的服务按是否扭曲价格和贸易区分为“黄箱”和“绿箱”两种，我国入世时亦承诺，对特定农产品的国内支持不超过该产品年度生产总值的 8.5%。现在的问题是，我国如何在较低农产品进口关税和符合 WTO 规则的前提下，加强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支持和保护，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努力提高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水平

展望未来一个时期，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战略目标，既面临风险和挑战，也具备基础和条件，通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下一步，要坚持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全面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努力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保障水平，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切实保护耕地资源，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命脉所系。一是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我国现有耕地 18.65 亿亩，随着建设用地的增加，今后耕地的保有量只少不多，要像爱护眼睛一样保护珍贵的耕地资源。要坚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全面

落实 15.5 亿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严禁“非农化”。耕地的保护不能只保数量，也要保质量。要完善耕地质量标准，加强质量验收评定，切实解决耕地转建设用地中的“占优补劣”问题，同时要实施好耕地质量保护和提升行动。二是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 2022 年建成 10 亿亩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要切实落实地块规整、渠系配套、地力提高、能灌能排、“以电代油”、机耕有路、防护有网等建设内容，解决一些地方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不高、投入不足问题。要进一步整合预算内投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土地整治资金，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加大中央财政投资。地方也要通过整合涉农资金、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调整地方债券使用方向等，加大投入力度。三是加快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加强节水供水工程建设，到 2022 年确保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10.4 亿亩，农业用水系数进一步提高。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展渠系末端计量水费试点工作。

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用现代化手段装备农业。耕地有限，科技无限。在有限的耕地上实现粮食的增产节本增效，根本出路在科技。一是加快种业创新发展。我国制种研发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差距，但也有亮点，有条件加快发展。要加强种质资源的普查、收集、保护和评估利用。支持科研院校和农业企业开展协作攻关，加强杂交优势利用、分子设计育种、转基因技术、高效制种繁种等关键技术研发，培育和推广高产、优质、抗逆、适机的突破性品种，加快良种的更新换代。要整合品种研发力量和种业企业，解决品种过多过杂和低水平竞争问题，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种业集团。二是加强农业技术集成创新和推广力度。要以农业科研体制和推广体系改革为动力，以推广先进适用技术为主攻方向，以广泛开展增产增效模式攻关为抓手，加强技术的筛选和集成，着手推广一批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病虫害绿色防治技术、地力保护提升技术、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农艺农机适用技术等，提高粮食生产的科学化、现代化水平。三是进一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这是粮食生产节本增效、提高竞争力的关键领域。2004 年以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进入快车道，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从 34.3% 提高到 2019 年的 70%，但是发展还不平衡。要支持农机装备产业加快转型升级，突破大马力机耕深翻、水稻机插机抛、无人机撒药、甘蔗机械收割、山地适用小型机械等方面的技术瓶颈，努力将农业机械化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四是支持鼓励智慧农业技术的发展和推广，推广“互联网+农业”，提升农业大数据的应用水平，推进农业经营管理模式的现代化。

优化农业布局和产品结构，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处理好确保粮食安全与优化农业资源配置的关系，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永恒课题。一是要明确作物安排的优先序。我国耕地资源有限，不能满足所有的农产品需求已是既定事实，因此国内农业作物安排必须有保有压、有取有舍。尽管大田生产比经济作物效益低，但是为确保粮食安全，国内农业生产仍然要按照一保口粮、二保谷物、三保重要农产品的优先序来安排，这是一个重要原则。二是优化区域布局。要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加快粮食生产功能区和主要农产品的生产保护区建设，“两区”建成后，国内生产可以满足 95% 的口粮、90% 的谷物、60% 的棉花和糖料、45% 的油菜籽消费需求。建设项目和投资要优先保证“两区”的需要，同时要建立健全主产区奖励制度和产销区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三是坚持大食物安全理念，统筹利用好农业资源。要大力推广套种、轮

作模式，积极发展粮草兼作、农牧结合的种养模式，提高土地利用率；要积极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统筹利用耕地、林地、草原、河湖、海洋资源，拓宽资源利用和食物来源。四是要按照市场需求，积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把低质低效和不对路的产品调减下去，把专用、优质、绿色、安全的产品生产发展起来，从整体上提高农业效益。

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稳步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在高起点上发展粮食生产，离不开组织制度创新。要在坚持家庭承包制不动摇、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基础上，适应农业农村分工分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一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是解决“谁来种地”问题的核心。近年来，包括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态势良好，显示出较强的市场生命力，是担纲未来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的生力军。变革中的农业大有用武之地，要通过广辟渠道、搭建平台、政策激励、引育结合，鼓励更多有志青年留在农村，支持大学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复转军人和城市知识青年下乡返乡创业。要高度重视农村实用型人才培养，建立政府引导、市场主体参与、适度竞争的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完善培训内容，加大培训力度，打造一支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农业人才队伍。要帮助各类主体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实际问题，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并带动小农户共同发展。国家对粮食生产和农业发展的各类支持政策，要进一步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二是引导土地有序流转，要通过建立县乡村土地托管机构和仲裁机制，降低土地流转的风险和交易成本，处理好转入转出方的利益关系，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三是大力发展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广大农户特别是新型经营主体提供全方位服务。政府要区分服务属性给予必要支持，提高服务的可及性和便捷性。

加大支农强农政策力度，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在当前有着特别的重要意义。一是要扭转财政支农支出趋缓的局面，切实加大对农业的投入。2018年，经合组织国家对农业的支持总额为3352亿美元，占其农业产值的29.2%，同比增加2.5%，且逐年上升；同年，我国的农业支持总额占农业产值的比例为17.8%，同比下降1.5个百分点，且连续4年下降。这显然与前些年粮食供求宽松、近年财政收支压力加大、一些地方抓粮的意识放松、责任淡化有关，确需引起我们的注意。鉴于目前农民种粮收益滑到新低、粮食供求面临转向紧平衡的关坎、内外部环境复杂多变，有必要发出加强粮食生产的信号，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千方百计增加财政投入，扭转农民种粮积极性、地方政府抓粮积极性下降的局面。新增投入要向主产区、新型经营主体，以及向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科技倾斜，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二是完善价格支持和生产者补贴。小麦和稻谷的最低收购价政策不能取消，要保持政策框架并加以完善。价格支持与生产者补贴作用机理不同，生产者补贴可弥补生产成本、稳定收益，而价格支持主要是稳定农民生产预期。小麦和稻谷是最重要的基本口粮，我国小麦、稻谷的生产供给分散在千家万户，需求刚性增长且替代性极小，要保证较高的自给率和市场稳定，没有价格支持稳定预期是不行的。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要尽量贴近市场，增加政策的灵活性和弹性，同时通过限定收购总量以适应WTO规则。各类生产者补贴要进一步完善，目前已将良种补贴、农资补贴和粮食直补合并为地力

保护补贴，按地亩打卡发放到农户，减少了操作成本，但如何强化对种粮的激励作用，还需进一步探索。东北的大豆、玉米等品种的生产者补贴如何统筹，还需要研究。三是加强金融、保险对农业的支持。继续实施定向降准政策，加大再贷款、再贴现支持力度，降低“三农”贷款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将贷款尽职负责制度落实到位，提高涉农信贷投放积极性。发展农村普惠性金融，优化农户授信机制，创新农业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拓宽抵押物范围，推广农业供应链金融模式。在政府的支持下，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较快，已覆盖了稻谷、小麦、玉米种植面积的一半以上，到2020年覆盖率要提高到70%。下一步，要进一步扩面提质，总结三大作物完全成本保险试点经验并适时推广，同时稳妥推进农产品收入保险，扩大大灾保险试点。

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加强储备应急管理。加强粮食的流通效率和储备能力，是确保粮食安全必不可少的环节。一是健全粮食市场流通体系。要坚持多主体、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粮食资源配置的作用，激发市场活力，加快发展粮食深加工体系，培育区域性粮食骨干企业。二是加强粮食仓储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在重要节点扩建新建改建一批仓储设施，提高智能化水平，增强安全运行能力。解决“卡脖子”路段交通运输瓶颈，畅通粮食物流。积极扩大散货物流能力（散装、散卸、散运、散存），提高自动化水平，将粮食流通环节的损失率由5%降到3%。三是完善储备制度，加强应急管理。要按照中办发[2019]48号文件的要求，进一步改革完善粮食储备管理制度，合理确定政府储备规模，科学划分中央储备、地方储备功能定位，优化储备区域布局和品种结构。中储粮要切实落实政策性功能和经营性功能分开的要求，充分发挥“大粮仓”作用。要完善粮食预警监测体系，准确把握国内外粮食形势，提高应急反应能力，防范市场异常性波动风险。要加强粮食需求侧管理，抑制不合理消费需求，减少“餐桌上的浪费”。

优化进出口结构，深化农业国际合作。要把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置于不断扩大开放合作的大背景下来加深认识，牢固树立开放型的国家粮食安全观。一是要充分估计中美关系紧张对粮食贸易的影响，坚持底线思维，在努力维护我国权益和贸易正常化的同时，要积极优化粮食及重要农产品进口的全球布局，推进进口来源多样化，建立长期稳定的进口渠道，避免受制于人。二是要完善重要农产品关税配额和国营贸易管理，健全进口监测体系，加强检疫检验，把握好进口规模、节奏和时机，同时严厉打击走私行为。三是把境外农业投资合作、构建全球农产品供应网络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来谋划和部署，充分发挥我国国内市场规模优势，充分考虑合作方的利益关切，进一步鼓励农业企业走出去，加强国际农业合作，完善全球农业供应链，提升对国际资源的掌控能力。四是主动参与全球农业治理，积极推动WTO改革，维护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和贸易自由化，积极争取于我国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新贡献。

（作者：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2021年2月1日）

我为什么喜欢看《通讯》

刘宏昌

编者按：作者刘宏昌曾是人民日报高级编辑、记者，市场报原副总编。作者阅读《通讯》二十载，期期不落，我们深感欣慰。作者对“三农”很是关心。曾向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送去《通讯》并附信，推荐《通讯》前主编郭书田的一篇文章《农民工返乡二次创业一项重大创举》，刊登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论坛通讯》上（2011年第十期），这篇文章，他读过多次，感到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具有深远意义；对郭书田写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并称郭书田为“情系‘三农’人。”对郭书田给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23条建议（2017.5.24）给予高度评价。文中还提到郭老是：“《通讯》发起人之一，老主编，像对待自己的生命那样，酷爱着期刊，为之奋斗三十载。”对孙万鹏的灰学理论；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刘济民的文章；105岁老者石山的文章；95岁的学者王凤林的文章；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贺雪峰的文章；《当前农村存在的六个问题》（2020.6.5）；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常委、北京市委主任委员靳晋的文章；《铮铮岁月，童心未泯》；任荣荣的《八论黄金桑产业》等老领导同志的文章反响较大。作者说：“《通讯》集中了农业农村部一大批老同志，这些老同志们丰富的阅历和经验，研究问题比较超脱，给部乃至中央建言献策，能够发挥在职干部不可替代的作用。”（刘中一部长题字）。 “他们似团团火焰，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燃烧着自己，照亮着别人。这样一大批老者，令人敬仰和尊重。”

2020年12月末，我收到贵所给我寄来的《通讯》文集，并附上一封致读者我的一封信，读后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感谢刘坚、卢继传总顾问，主编胡兆荣、副主编辛梅、编辑孙正恩等同志，多年来精心编辑此刊，为读者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不辞辛苦地劳作。我还永远感恩前主编郭书田，是在二十年前，一次研讨花生产业会上相识，他主动提出将此刊赠送给我看。阅读《通讯》二十载，每期不落，重要的我感兴趣的剪下留存。说来，我很惭愧，愧对诸位，也愧对贵刊。我没有为《通讯》撰稿，只享受甜美的果实，却未从栽培、施肥、灌水于果树。今天收到编辑部发来的慰问信，感到由衷的兴奋又有惴惴不安之心情。

《通讯》提供了诸多“三农”信息，是我终生渴求的。我出生在山东胶东半岛（威海文登县），农村山沟里长大的，“文革”前大学毕业后，来北京人民日报社工作到退休。但总没忘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

与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对“三农”很是关心，牵挂着农民兄弟。“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全民奔小康，“三农”是短板，农村中存在的许许多多问题，在《通讯》中都有所披露，不好公开见报的，能在本刊讲出来，难得。

专家学者的“建言献策”，更引起我的兴趣。首推郭书田同志的文章。10年前，我曾向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送去《通讯》并附我的信。信中说：“我向本报推荐一篇文章《农民工返乡二次创业一项重大创举》，刊登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论坛通讯》上（2011年第十期），作者郭书田。这篇文章，我读过多次，感到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具有深远意义。想到两亿多在城市的农民工，将来去向何方？他们中一部分人要留在城市，相当多的人要返乡回到故土，去广阔的天地施展作为，这个问题我退休后经常思索难解，读罢此文，心头一亮，特建议本报能登载这方面的文章，紧扣‘三农’，颇有见地。作者为农业部老司长，知名专家，离休后写了许多有份量的好文章，去年他读姜春云论调查研究一书，所撰写的长篇评论，刊发在本报二版，反响较大。”

我推荐的郭老这篇文章，总编转到本报农村部，石沉大海。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典型也没有引起重视，何谈当初？

郭书田于2016年6月16日在《通讯》发表的文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文章说：“总之，我们在农民问题上，欠农民的太多，‘赤字’太大，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处于失衡状态，成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短腿。”“产生上述问题的根子在于决策上违背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原则，违背了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认识论，即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形而上学。需要从上到下认真从思想理念上‘反思’经验教训，做到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读后感言：好一个“三个违背，四个主义”，像一篇直谏政府官员的檄文，当头棒喝，对“三农”负有责任的当权者，读了之后，不出一身冷汗！不问心自责吗？

读罢此文，我评议郭书田太了解农民，太热爱农民了，太敢于为农民讲话，太敢于为农民伸张正义，哭农民，农民苦，我称郭书田情系“三农”人。

郭老在当时较早提出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不正之风，当年上头设计并没有引起重视，第二年似也无声音，到第三年中央及顶头设计，报纸社论才得到重视，是不是因为《通讯》的这篇文章发挥的作用，不得而知。但足见郭书田的远见卓识，贤良谏言，是大有作为的。

郭书田刊发“三农”的文章是多方面、多角度、全方位的，其观点鲜明，如快刀斩麻；材料奥详，如封存仓储；爱民、哭农，倾吐天下父母心及兄弟姐妹情。每一期都发一二篇，都是有的放矢，有感而发。他给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23条建议（2017.5.24）是一篇高屋建瓴、言简意赅，表达了一位老共产党员对党的赤胆忠心。

建议第十一条说：提高扶贫标准。现行标准为人均年收入不低于 2300 元（日消费不低于 1 美元），低于国际标准（日消费不低于 1.9 美元），建议在实现按现有标准脱贫的基础上，与国际标准接轨（浙江省 2015 年已消灭绝对贫困到户，标准不低于 4600 元）。

建议第十八条说：大力转变不良风气。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严重泛滥，影响党的形象与执政地位。为此建议，把转变作风从上到下作为治党、治国、治军的一项重大任务。在作风、文风、学风、会风方面，做到上梁正，下梁则不歪，上不有甚者下则不必甚焉，上不行下则不效。大力弘扬“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精神，认真解决“文山会海”以及“正确废话”问题。

《农村政策失误的反思》——纪念中国共产党 90 周年（2019.1.5），从十个方面总结 1949 年到 2019 年，70 年我党在农村工作中失误的经验教训。《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及《在农村改革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2018.7.20），再次阐述“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呼吁出现一批敢讲话的当代人。

这位临近九旬的老人，是《通讯》发起人之一，老主编，像对待自己的生命那样，酷爱着期刊，为之奋斗三十载。可以说，他是《通讯》的主心骨，是通讯的灵魂。

人类重大的成功，无不经历错误与失败……连古今中外的“圣人”、伟人、科学泰斗都不能幸免。然而“在科学的发展上，对严重谬误论见的揭露，其价值不亚于创造性的发现”（见弗里奇：引自《科学研究的艺术》第 54 页，科学出版社，1979）。

以上引用的这段话是来自孙万鹏灰学文集首卷开卷语。

阅读《通讯》，令我喜欢并为之崇拜的另一位作者是孙万鹏。他和心爱的夫人吴文上（高级农艺师），并肩合作，把灰学理论应用到农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治领域，并获得成功。1993 年二人提出“灰农学”这一新学科。孙万鹏从研究农学领域到哲学，又从哲学，生命科学，不同领域，不同科学，都有不平凡的业绩。他创造了三大奇迹：灰学创始人，用灰学理论战胜癌症，又运用到文学创作。前二十多年，他每期都在《通讯》上发一二篇论文，并集纳成书。他的文章我必阅看，剪下留存。2019 年，他新出版的灰学文集套书送给我，皇皇千万文字，论述古今中外科学发展史，哲学发展史，是文库，百科全书，读一读就会感觉到，作者知识渊博如大海，洞察力如晴天霹雳，层层逼进，如高厨剔肉，严谨而流畅，散文式的优美文字，真是了不起的灰学理论大师。他的巨著，我摆放在案头最近处，经常翻阅，写点东西，经常查找，已成为我离不开的辞典和工具书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生命攸关时，倍显刚毅本色，更铸大智大勇，其忧国忧民之心常常因之而得以辉煌之显示。当今，金钱至上，浮躁尘嚣，能潜心钻研，拼命著书立说，少之又少。孙万鹏与我同年，他的奋斗精神，激励着我，不可懈怠。

还有一位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刘济民，他在《通讯》撰文，那股精气神，浑身是胆，气如长虹，已出

五本散文集，成为著名作家了。还有 95 岁的学者王凤林，为灰学创始人出谋划策，105 岁老者石山，提倡“林草兴邦”，长寿秘诀“能吃，能睡，能骂人，敢于直言。”……

阅读《通讯》（2020. 6. 5）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贺雪峰的调查报告《当前农村存在的六个问题》，触发我对“三农”问题别样的思考和忧虑。该文最后说：“以上六点应当是当前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可以总结为文化失调的问题，当前农民之苦不是苦于物质匮乏，不是苦于劳动繁重，而更是苦于他们在生活中丧失了价值感。缺少了由人与人之间稳定联系所形成的相互期待与合作，无法从闲暇中生产出有品质的生活，反而产生出各种低俗的伤害身心的恶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文化建设。

像这篇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揭露问题和阴暗面，一针见血的文章，有其特殊价值和意义。习近平总书记 2020 年 12 月 30 日再次指出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而特别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及科学知识，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中央的决策，不正是来自像贺雪峰等同志敢于直言的调查报告吗！

2020 年第 12 期，刊发了靳晋《铮铮岁月，童心未泯》，这位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常委、北京市委主任委员的文章，令人振奋，说自己不同时期为拼命三郎、拼命四郎、拼命五郎。他的精神境界可以推及到为通讯撰稿的许多农业战线的老同志，退下来也未从停闲，仍在拼命总结经验教训，建言献策。《通讯》凝聚了十几位、几十位拼命三郎、四郎、五郎，他们似团团火焰，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燃烧着自己，照亮着别人。这样一大批老者，令人敬仰和尊重。

《通讯》是一个舞台，汇集许多农业战线专家学者，在此登台演技，施展才华，演奏出威武雄壮的话剧来。《通讯》是阵地，这里是老战士奋斗之地，他们有话则讲，有不平则鸣，有内心喜怒哀乐则倾吐出来才痛快。《通讯》像一块肥沃土地，长出能提供丰盛精神营养食粮，滋养着许许多多的人们。可谓台上台下，共唱“三农”大戏。

可以说，《通讯》“集中了农业部一大批老同志，这些老同志们丰富的阅历和经验，研究问题比较超脱，给部乃至中央建言献策，能够发挥在职干部不可替代的作用。”（刘中一部长题字）。

《通讯》还大力宣扬农业战线新事物，新技术，新项目，新典型，像最近推广任荣荣的《八论黄金桑产业》，则不惜篇幅，连续登载。不破不立，推陈出新，老而不朽，老专家、学者有丰富几十年经验教训，见新的东西，也会激发特别热情，兴趣盎然，乐意接受新事物，新技术。有活力，有魄力，这也是《通讯》又一特点。

读《通讯》还能增强许多健身保健知识，更新陈旧老一套看病观念，又首推孙万鹏的第三种医学，顺势疗法等，《通讯》刊登过几篇百岁老人生死观之类短文。

谈到“人类与世界万物一样，有生必有死。现代科技表明，人类在浩瀚的宇宙中，由众多的粒子组成各种存在，人死成灰，即成众多微小粒子，去组成万物存在。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生前说，在他身后希望早日回归基本粒子组成的新的各种存在，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人身转世’，是唯物主义人生哲学，非唯心主义迷信也。”

读罢这些老人，直面谈死亡，讲得如此轻松，带有诙谐幽默之感。死亡并不惧怕，坦然应对，虽然难以做到，但也要终生修练才是。

《通讯》还介绍老农村部的离退休干部读书会，我好似听到团结湖畔朗朗的读书声。一位老同志谈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在老家山东文登县（我的家乡）做农村基层工作，带领农民打深井的情景，顿时使我联想小时候，我父亲是农村老党员、老村干部，带领村民打井吃水的艰难岁月，给我写这方面的回忆录，提供了可贵参考。还有一位驴协会老会长，前年他一篇文章说到养驴的经验做法，非常细致入微，又给我写父亲这方面的回忆录，提供了参考。如此，等等。

《通讯》给予我实实在在“实惠”，沉甸甸的“礼物”，恰似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营养着我，滋润着我，让我提神，乐而不怠。

本人拉杂写下读后感，最后还要啰嗦几句，想起《通讯》总顾问卢继传先生谈人性化的管理艺术一文中的教益，他在文章中说——真诚地赞美别人。这是美国教育家戴尔·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一书中提出的理念。

人到底在欲望些什么？他写道，除了健康、物质、婚姻之外，最受人追求的是“受重视感”。他如此说：“我能唤起他人工作的热情，这种能力是难以用金钱衡量的财富。如果想发现他人的优点，最好的方法就是赞美与鼓励。”

“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奋。”人人渴望被别人欣赏、激励，这是人性中最深切的心理动机之一。

我借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卢继传先生这段话语，缅怀于他，惊悉他上个月刚刚离世，万分悲痛。他是报社我的老同事，退休二十余年，是拼命三郎，操碎了心。也借用他的话语，馈赠本刊编辑们，馈赠在《通讯》发表诸多文章，让我受益匪浅的老学者、专家、新老朋友们，祝大家新春身体健康，精神永驻，快乐的生活。

读者刘宏昌敬上

2021年2月 春节间

（作者：人民日报高级编辑、记者，市场报原副总编）

问题视域下新中国 70 年“三农”的转型发展

郑有贵

【内容提要】：“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工业革命以来普遍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推进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三农”问题，与发达国家的“三农”问题有一些差异。中国的“三农”问题不是固化不变的，而是在发展进程中跨上一个更高台阶后的问题。70 年来，中国“三农”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源于党和政府不回避问题，勇于正视问题，并基于这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主动施策，探索形成了破解“三农”问题之路。

关键词：“三农”问题；弱质性困扰；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转型发展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70 年，是党和政府不断解决“三农”问题的 70 年。在工业化进程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与工业、城市、城镇居民相比，农业、农村、农民呈现出明显的弱质性。面对“三农”问题，党和政府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主动施策，为促进国家现代化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于统筹长远与近期发展、全局与局部发展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探索形成破解弱质性困扰的“三农”问题之路，这是中国工业化和“三农”均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

勇于正视并解决弱质性困扰的“三农”问题彰显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精神

新中国成立 70 年间的“三农”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是梳理总结新中国 70 年“三农”问题经验首先需要辨析的问题。

“三农”问题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存在，而且现在依然存在，贯穿于新中国成立后的 70 年。如果仅从“三农”问题的字面来理解，那新中国 70 年“三农”似乎仍停留在原点，但实际上，新中国 70 年“三农”实现了跨越发展，到达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高点，而且远高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的预期。问题与发展是贯穿“三农”70 年历史演变的两个方面，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

中国“三农”问题的存在及破解难度，既有工业化的共性原因，也有国情所致的特殊原因。

共性原因在于“三农”问题是工业革命以来普遍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结构性变迁，在三次产业结构上，表现为二、三产业所占份额大幅度提升，而第一产业所占

份额大幅度下降；在城乡人口结构上，呈现出城镇人口所占份额大幅度增加，而农村人口所占份额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是如此。实现经济恢复发展后的 1952 年与 2018 年相比，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51.0% 下降到仅有 7.2%；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 12.5% 提高到 59.58%。^[1]这种结构性变化和发展态势，不仅缘于工业是现代化的先导产业，以及工业化、城镇化被各国政府视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予以政策倾斜，更是缘于资源配置的机会成本差异，即由于生产率、价值链中的位置等差异，而导致投入回报率工业高于农业。正是缘于此，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这虽有利于农场经营规模的扩大，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象普遍存在，使得农场无法从根本上摆脱经营困境，如近年美国中西部地区农场破产数量增加即是一种表现。^[2]

而由中国国情所致的特殊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新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人心所向的奋斗目标。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工业化是我们破解后发国家劣势窘境、实现跨越发展的法宝。为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国家不得不动员全国人民艰苦奋斗，不得不选择农业向工业提供更多资本积累和农产品供给的政策，由此农业积累放缓，加之长期实施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城乡户籍管理制度、人民公社制度以及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使破解“三农”问题复杂而艰难。另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国，即便大幅度提升人口的城镇化率，仍然有庞大数量的人口留在农村，不可能改变人均耕地少及相应的人均土地经营规模小的问题，这不仅存在经营规模不经济问题，还由于经营规模小而不利于国际竞争。因此，即便实施工业反哺农业，“三农”的弱质性在较长时间仍难以根本改变，缩小城乡差距还需时日。

共性原因和特殊原因叠加，使得农业、农村、农民与工业、城市、城镇居民相比，呈现出一定的弱质性，使新中国 70 年来解决“三农”问题极为困难而又错综复杂。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从来没有在推进国家工业化乃至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回避“三农”问题，而是特别清醒地认识到“三农”问题的实质。正视并努力解决“三农”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而勇于担当使命的体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强烈的问题意识。

70 年破解弱质性困扰的“三农”问题彰显“三农”转型发展成就

新中国在成立后 70 年间不断破解“三农”问题，实现跨越发展，呈现出以下明显的特征。

（一）台阶式破解“三农”问题

中国破解“三农”问题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1949–1952 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在这一伟大社会变革的基础上，党和政府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国家工业发展奠定基础出发，在老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基本完成土地改革，不仅确立了农民在新社会中当家做主的地位，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快速恢复和发展，而且更成为新中国 70 年“三农”发展的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 1953-1978 年,针对传统经验和一家一户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缺少畜力、生产工具和基础设施水平低下等问题,党和政府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建立起农业生产合作社及之后的农村人民公社,形成了集体统筹和积累机制,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并以此为基础,促进了农田水利、农村道路等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农业科技应用、机械化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的发展,粮食产量由 1949 年的 11318.0 万吨、1952 年的 16391.5 万吨提高到 1978 年的 30476.5 万吨。[3]农业生产水平的大幅度提升,不仅解决了全国人口由 1952 年的 57482 万人增加到 1978 年的 96259 万人^[3](p. 608)的吃饭问题,还为国家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提供了大量的农产品和资本积累,保障了国家工业化战略的顺利实施。

第三个阶段是 1978-2002 年,中国在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后,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发挥农民的创造性,不仅促进了农业的全面发展,还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走出了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之路。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并进发展,实现了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重大突破,拓展了“三农”发展的路径和空间。

第四个阶段是 2002-2012 年,基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乡村建设滞后的问题,从构建和谐社会和有利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出发,2005 年 10 月 11 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4]“十一五”规划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

五个阶段是自 2012 年中共十八大起,针对“三农”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短板,党和政府开启乡村全面振兴进程,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实施脱贫攻坚战,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上述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工业化进程中“三农”弱质性的世界性课题,朝着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方向发展,促进“三农”发展实现质的飞跃。

新中国成立 70 年“三农”五个台阶式的发展表明,中国的“三农”问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这说明它不是固化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发展到更高阶段后的问题。

(二)“三农”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性进展

新中国 70 年“三农”的发展历程是不断推进现代化的历程。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观点。^[5]1949 年 12 月,周恩来在对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人员的讲话中指出:“必须把城市工业组织起来发挥领导作用,才能使农业现代化、机械化”。^[6]1954 年 9 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

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6] (p. 176)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建设现代农业提至“四化”之首。^[6] (p563) 经过70年的努力，中国“三农”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一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新中国大力推进现代农业科技的研究和推广工作，农业科技应用水平和农业机械化率不断提高，“据科技部资料，2018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8.3%”；现代技术装备水平极大提高，“2018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67%”，^[7]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中，改变了过去以人力、畜力为主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劳作方式，不仅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还把大量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的全面发展，仅粮食产量而言，“201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3158亿斤，比1949年增长4.8倍，年均增长2.6%”，^[7]不仅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了自己的手中，还较好地满足了人民对食物消费多样性的需求。

二是传统乡村向现代乡村转型。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乡村发生了明显变化，由狭窄不平的土路、土墙、茅草屋变为水泥硬化路、楼房，随着电力、现代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现代医疗、现代教学方式等的推广，美丽乡村逐步建设起来。乡村发展后，不仅成为农民的美丽家园，还成为城市居民休闲娱乐和体验农耕文明的乐园。农业功能由主要提供农产品向发挥多种功能拓展，农村不仅发展农业，还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2018年，休闲观光、乡村民宿、健康养生等园区景点接待游客30亿人次，营业收入超过8000亿元，^[8]不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而且满足了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后的多种需求。随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乡村逐渐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自治发展，促进了乡村事业的发展和乡风文明建设。

三是农民素质全面提升。在旧中国，农民基本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如此低的文化素质制约着“三农”的发展。正因为如此，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把治盲、治愚、治病作为切入点。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不仅在农村开展识字运动以扫除文盲，还积极发展农村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社会保障等事业。例如，改革开放前，基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起来的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保障了农民基本的医疗需求，这一做法引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和一些国家的代表还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拍摄“赤脚医生”工作的专题纪录片，1978年召开的国际初级卫生保健大会将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经验写入《阿拉木图宣言》，并将其作为解决初级卫生保健的成功范例向发展中国家推广。^[9]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事业跨上新的台阶。现今，全国农村已普及了9年义务制教育，建立起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构建起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村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体育事业发展的重大突破，大幅度提升了农民的综合素质，积累农村的人力资本，成为农业农村乃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非农产业，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836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266万人”、“本地农民工11570万人”。^[10]7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了大幅度提升。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14617 元”，“全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 3721 元”；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降低至 30.1%，表明农民生活质量显著改善；全国共有“3520 万人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455 万人享受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10]

在“三农”实现跨越发展的同时，还为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撑，如为工业提供农产品原料、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工业提供积累、通过出口农产品换取购买工业技术装备所需的外汇等。

探索形成破解弱质性困扰的“三农”问题之路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面临劣势窘境，加上缺乏经验以及实践不充分条件下的理论认识偏差，在探索破解“三农”问题上有过曲折。尽管如此，“三农”实现历史性跨越发展的事实，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探索形成的发展路径对于破解弱质性困扰的“三农”问题是有效的和成功的。中国之所以能够探索形成破解弱质性困扰的“三农”问题之路，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一）中国共产党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以破解“三农”问题的弱质性困扰

如果国家治理受利益集团控制，那么，小规模经营的农民的发展诉求是难以顺利表达的，国外如此，旧中国也如此。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变了这一状况，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在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之际，把农业摆在国民经济的首位；在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后，明确要首先解决好农民和农村问题；在进入工业化中期，明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进入新时代，明确把坚持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70 年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促进“三农”发展而不懈怠，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忘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并基于解决好“三农”问题进而实现乡村振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的认识，因而能够在解决好“三农”问题的行动上高度自觉。正因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才能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70 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在调查研究了解农民需求的基础上进行重大战略部署，除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对发展“三农”进行战略部署外，还有 11 次中央全会对“三农”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制定实施了 21 个以解决“三农”为主题的中央 1 号文件以及数量众多的专题性文件，及时解决“三农”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这是“三农”能够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探索共同发展道路和实现组织化规模化的形式

中国“三农”问题能否解决，根本在于是否具有较强的内生发展能力。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一家一户经营规模过小，因而在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有很多难题需要破解。把农民组织起来提高经营规模，有利于提高“三农”的内生发展能力，这是改造传统农业的必由之路。中国“三农”实现跨越发展，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集体所有制，在此基础上探索共同发展道路和现实组织化规模经营的形式。

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出发，同时也是从解决土地改革后分散的一家一户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出发，中国共产党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并在这一进程中逐步完成了由农村土地农民所有向集体所有转变。这一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自建立之日起一直坚持至今，其间只是进行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而已。其中较大的变化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对土地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中共十八大以来，逐步实行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的制度。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建立和坚持完善，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农村社区集体统筹和积累机制，既有利于增强“三农”的内生发展能力，从而破解“三农”弱质性困扰，还保障了农民能够朝着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断前行。在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解决了农民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促进了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同时也避免了农村两极分化现象的发生。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一些地方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出发，通过改革，对社区集体统筹和积累机制进行完善，发展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小城镇；即便集体经济弱而积累少的村也能通过“一事一议”促进社区集体事业的发展。基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所形成的农村社区集体统筹和积累机制以促进“三农”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也是中国传统乡村社区建设实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传承发展。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还避免了无地农民涌向城市形成贫民窟现象，为农民安心外出创业就业提供了保障，并促进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健康推进。一些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在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造后，明确了农民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产权份额，这一组织制度的探索形成也能保障农民变市民的权益，进而有利于促进城镇化的顺利推进。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中国特色的组织化规模化生产经营多种形式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在对集体土地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形成了多种组织化规模化的经营形式：有家庭农场，有多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专业合作社的联合社，有公司+合作社+农户，有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等等。在多种组织化规模化经营形式中，农民还可以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及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探索形成组织化规模化的多种形式，有利于更充分地在组织化规模化进程中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和权益，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共享发展路径，这是中国的特色。

（三）从促进国家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出发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工农城乡关系

70年来，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不是孤立地就“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而是从促进国家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出发，通盘统筹促进“三农”发展与国家工业化发展，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呈现出以下明显特征。

第一，基于工业化进程中“三农”的弱质性困扰，着力补齐“三农”发展这个短板，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夯实国家现代化发展根基。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促进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曾发生过工业增长偏快的工农城乡发展失衡，党和政府能够及时进行调整，如 20 世纪 60 年代初、70 年代末、80 年代末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强化了农业的基础地位，使 70 年的国民经济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整个国民经济稳健发展，避免了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现象的发生。进入 21 世纪，针对城市快速发展而农村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针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三农”这一短板，相继提出“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11]重塑城乡关系^[12]，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13]、城乡融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14]，明确了“到 2050 年如期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15]

第二，根据工业化发展阶段处理好工农城乡的“取”与“予”的关系，形成长时段视域下的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政策体系和发展机制。在工业化初期实行农业支持工业或称农业养育工业政策，在进入工业化中期则转变为工业支持农业或称工业反哺农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要实现工业化的跨越发展。新中国工业化实现跨越发展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这一过程同时也促进了“三农”的跨越发展。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发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较好地处理了长远与近期发展、全局与局部发展关系。在推进国家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成功地实现工业化所需资本的快速积累，这不仅是因为党和政府号召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及选择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取向，还因为我国顺利地实施了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在实施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过程中，党和政府从一开始就注重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把握好对农民“取”的度，并通过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简称粮食“三定”）、工农业产品价格比价、税收、农用工业等保障农民的基本利益，促进了“三农”发展。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尽管实行农业养育工业政策和城乡二元体制，但工农城乡差距可控，仅以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例，1978 年为 2.57: 1。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1984 年，农村改革率先成功突破，农业农村快速发展，逐步缩小了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至 1984 年的 1.84: 1。自 80 年代中期起，城乡差距再度拉大，这是由于在市场条件下的马太效应所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到 2009 年高达 3.33: 1。从 21 世纪初起，党和政府基于工业化进入到中期阶段，将农业养育工业的政策调整为工业反哺农业，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践行共享发展理念，探索通过股份合作而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推广利益分红型模式，通过‘订单收购+分红’‘保底收益+按股分红’‘土地租金+务工工资+返利分红’等方式，促进农民持续增收”。^[8]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应坚持这种有益探索，促进以共享发展为取向的新型工农发展关系的构建和完善，

这也是新中国 70 年促进“三农”发展的基本经验之一。

综上所述，70 年间，中国“三农”实现了跨越发展，源于党和政府不回避问题，勇于正视问题，并基于这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主动施策，探索并形成了破解弱质性困扰的“三农”问题之路。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19 年 3 月 1 日；国家统计局：《新中国 60 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08、612 页。

[2] 陈立耀：《中国农业需要警惕！美国农业正在破产，原因有 5 点》，搜狐网，http://www.sohu.com/a/293681236_379553，2019 年 5 月 15 日。

[3]国家统计局：《新中国 60 年》，第 637 页。

[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66 页。

[5]《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32 页。

[6]《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9 页。

[7]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农业生产跃上新台阶现代农业擘画新蓝图——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二》，国家统计局网，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8/t20190805_1689117.html，2019 年 8 月 10 日。

[8]韩长赋：《国务院关于乡村产业发展情况的报告——2019 年 4 月 21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1904/1e30cb31a2a242cdb82586c5510f756d.shtml>，2019 年 5 月 17 日。

[9]姚力：《卫生工作方针的演进与健康中国战略》，《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 年第 3 期；艾笑：《中国的经验可望又可及我国妇幼保健成就令国际瞩目》，《人民日报》1995 年 9 月 8 日。

[10]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19 年 3 月 1 日。

[1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6 页。

[12]董峻等：《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7 年 12 月 30 日。

[13]《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人民日报》2015 年 2 月 2 日。

[14]《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摘登》，《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19 日。

[15]《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人民日报》2018 年 9 月 27 日。

（作者：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 年第 5 期）

邓小平论农业改革发展二次飞跃当列为“重中之重”之重

李毓堂

一、居安思危与“三农”问题

中央一直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四十年来农业发展取得很大成就。然而“三农”一直是国计民生发展中的“短腿”、“短板”和弱项。“三农”的老大难问题，诸如：农业化学污染成倍高于世界水平；重要农产品缺口和进口占比越来越高；农民人均收入同城市人均收入实差连年扩大；农村内部各项建设事业长期滞后等。由此已严重困扰国家粮食和食品安全，生态和环境优化、资源集约利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循环、加快建成创新型强富美国家的总体战略。还集中表现为社会三大差别加剧，有悖党的初衷与使命。

由于“三农”问题是一组相互联结因果互动矛盾交错的复杂事物。如何科学有效破解？实践证明，以往采取分隔应对各事论事、泛泛其谈不得要领或仿照西方模式生搬硬套等方法，绝难济事。只有抓住主要矛盾高屋建瓴，采取切合国情特点综合治理的方法才能成功。由此审时度势，就需要重温邓小平关于农业改革发展二次飞跃的理论。

二、重温邓小平同志关于农业改革发展“二个飞跃”的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就是他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创立了中国农业改革发展理论。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坚持长期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规模经济，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以下简称“二次飞跃”）（《邓小平文选》第3卷355页）

他还指出：“农业要有规划，首先要增产粮食。农业翻身不能只靠粮食，主要靠多种经营。”“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22页）

重温邓小平理论，能使我们与时俱进心明眼亮，作出科学的战略决策。

三、时代要求与“二次飞跃”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强富美，“三农”必须强富美。这就把“三农”发展提高到国家振兴的重要战略位置。

十九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全会号召：“要增强机遇和风险意识”“善于在危机中看先机，在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奋勇前进。”

据此时代要求，当可判识邓小平指出“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需要”启动“二次飞跃”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1. 邓小平指出的“适应科学种田需要”，可包括农业科学技术、科学经营方式和科学产业结构。

从科学技术来看，我国农业要消除化学污染危机，就必须全面普及生物科学技术，向绿色高效生态农业转型升级。适应这一需要，就要启动“二次飞跃”。

从科学经营方式看，我国农业要摆脱个体分散低效的小农经营困境，就必须创建集约高效的科学经营体制。适应这一需要，就要启动“二次飞跃”。

从科学产业结构看，我国农业要走出困于初级生产效益地下的陷阱，就要延长农业产业链，创建农（牧）工商三产一体化多层次高效益的产业结构。适应这一需要，就要启动“二次飞跃”。

2. 邓小平指出的“适应生产社会化需要”，应指农业生产已超越自身，成为至关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社会化大生产。

从国家社会发展目标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今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目标是：“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要“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由于在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中，“三农”都居于主体地位。因而适应这一需要，就要启动“二次飞跃”。

再从中央社会发展战略来看，提出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战略、扩大内需基点战略、绿色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安全发展战略以及优先发展农业农村战略等。由于在落实这些重大战略中“三农”改革创新都起着关键作用。因而，适应这一需要，就要启动“二次飞跃”。

更从消除社会三大差别来看，要坚守党的初心和使命，适应消除社会三大差别的需要，就要启动“二次飞跃”。

四、“二次飞跃”将开创的新局面

1. 大文章大舞台。

“二次飞跃”正是邓小平讲的农业破题的大文章，是中国农业转型升级进入现代技术与产业的大变革。它将成为深化改革创新发展：家庭经营、集体经济、密集技术、系统管理、农工商并举、生态治理、人才培养及乡村各行各业竞相兴起的大舞台，充满活力与机遇。

2. 大动力大跨越。

“二次飞跃”将燃起农民追求美好未来的巨大热情和主人翁感、获得感的自主能动性。组织起来的农民在共同创业中将再现热火朝天的情景。农村成为有奔头、有广阔天地的用武之地，将吸引广大城市知识青年和有识之士下乡创业。从而大大增强“三农”发展的内外动力。

3. 大智慧大创新。

农民群众在历史上早已显示出无穷智慧。在“二次飞跃”大潮中，必将迸发出更大的集体智慧用于事业创新。从而实现亿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创新驱动“三农”发展。

4. 大生态大经济。

“二次飞跃”将极大地释放出农业生产力，驱动绿色高效兼有国土治理功能的知识密集型农、林、草、沙、海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以大手笔打破以往重在 18 亿亩耕地上做文章之题，使百亿亩以上的国土资源发挥出经济潜力，实现既是绿水青山，又是金山银山。从而实现以“多种经营”使“农业翻身”和生产力倍增的大跨越。农民增收致富赶超城市水平，并大大增强扩大内需后劲。确保我国由农业大国变为农业强国。粮畜优质产品出口量超过美国成为支援世界最大国。

5. 大振兴大同路。

“二次飞跃”将促进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及道德修养大提高，从而缩小体脑劳动间的差别。乡村百业兴旺全面振兴将发展成为既保有“乡愁”美景绿色环境，又拥有现代设施的特色小城镇。由此实现我国大中小相结合的城镇化，使社会三大差别逐渐消除，我国率先进入大同社会。

钱学森在论述第六次生物新技术和大农业产业革命时曾预言：“这将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大调整，生产力组织的大改组”。“这种高技术产业化的农业，实际上已和工业及经营服务等二、三产业结合起来了”。“由此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已经大大缩小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发展的结果是，将在 21 世纪的中后期，迈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这正是实施“二次飞跃”的美好未来。钱老说：“看到美好的未来了，中国人就要通过革命的实践去创造这个未来。”

五、关于“二次飞跃”实施中的若干问题

1. 提高全党全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共识。

要坚持以习近平指出“三农”必须强富美为总目标总任务，以邓小平指出“两个飞跃”理论为改革发展的指针，以钱学森提出开展第六次生物新技术和大农业产业革命发展知识密集型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务实路线图。。

2. 需拨正目前对“三农”发展及农业现代的种种误判误识。如在加快发展生态农业问题上，认为我国化学农业已积重难返，如急于“弃化”会造成“减化伤农”“去化毁农”危险，因而消极待慢。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问题上，心有余悸顾虑重重，担心重蹈人民公社复辙。在农业现代化问题上，认为只要搞“小农现代化”加上服务组织，就能实现农业现代化，无需实施“二次飞跃”。在解决三农问题上，认为效法西方模式将多数农民引入城市落户，就可奏效。在乡村振兴着力点上，强调以工补农外力推动，忽视通过“二次飞跃”调动农民内动力，等等。无疑，这些误判误识如不拨正，必将影响“二次飞跃”、“三农”健康发展和农业现代化顺利运行。

3. 将“首次飞跃”成果和“二次飞跃”相结合。家庭承包制在实践中已显示出基本优越性，在“二次飞跃”中要结合这一成果，发展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第一产业、同集体经营的二三产业结合，形成三产一体化，集约高效循环的大农业产业体系。运行中可先在 222 万个农业合作社基础上，延长产业链扩大规模经营，加强技术配套系统管理，实现转型升级。

4. 大力推广各项前沿生物新科技成果和绿色高效兼有国土治理功能的新兴产业。同优化利用上百亿亩国土资源相结合，全面发展农、林、草、沙、海五大新兴产业，推进农业生产力跨越式增长，确保我国由农业大国变为农业强国。

5. 以国家实力为后盾，加大支农、惠农、补农政策力度，完善乡村金融农贷网络。将资金集中优先用于“二次飞跃”的各项创新事业，实现补短板强弱项，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6. 加强统一领导，把“二次飞跃”列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重点，成为今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之首要目标任务。

实施“二次飞跃”，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三农”实现强富美，涉及各级党政部门和全社会的复杂巨系统工程。要借鉴脱贫攻坚的经验，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统筹安排，周密部署，依照区域特点，制定规划计划举措，组织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精准稳地实施，一定会早日完成这一宏伟的历史使命。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发展壮大农村新型集体经济”。但尚待列为主导战略举措。又据新华社 2 月 3 日报导，当年带头实行家庭承包的小岗村，现在集体经济发展迅速，农民的集体经营收入越来越多。由此看来，践行农业改革发展“二次飞跃”已是大势所趋。否则，仅用目前措施是难以解决好“三农”问题，真正达到乡村振兴目标的。

（作者：原农业部政策研究会研究员，中管院农经所特聘专家、高级经济师，2021 年 3 月 12 日）

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送：有关部委司局、全国各省农委（农业农村厅）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及各研究所
发：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各处、室、中心及下设机构

总 顾 问：刘 坚 郭书田
副 主 编：辛 梅
邮 箱：zgynjs@163.com moagov@163.com
网 址：www.zhongguanyuan.com.cn
 www.moagov.cn
地 址：农业农村部北办公区 16 号楼、18 号楼

主 编：胡兆荣
编 辑：孙正恩
邮 编：100125 100810
电 话：010—59195293 66117652
 010—66067899 66167899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南 3 楼、4 楼

